

「*Adat* 實踐與 *Temuan* 人：一個馬來西亞森美蘭州 母系社會的民族誌」博士論文簡介

梁志輝

馬來西亞國民大學馬來世界與文明研究所人類學博士候選人
本院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學員

一、前言

Adat 在島嶼東南亞是一個非常普遍的辭彙，雖然它是一個來自阿拉伯語的衍生字，但卻是整個馬來世界傳統文化的中心象徵，它是慣習、生活法則，也是一種生活知識。過去有關 *Adat* 研究的論述多集中於探討印尼西蘇門達臘（west Sumatra）與馬來西亞森美蘭州（Negeri Sembilan）的米南加保人（Minangkabau）及其移民後裔，因為米南加保人有著母系親屬系統著稱的 *Adat* 體系（*Adat Perpatih*）。對於 *Adat* 的研究雖有很長的歷史，然而這些研究論述中或者強調 *Adat* 與 Islam 文化之間的衝突與否；或者強調 *Adat* 在法律與政治上的特性，如母系財產的繼承、*Adat* 的行政組織等，這些研究往往忽略了 *Adat* 的地方性，特別是在日常生活實踐中所表現地方意義。

不同於以往的研究取向與對象，本研究是關於一個母系原住民族群（*Orang Asli*）的 *Adat* 研究，研究地點位於森美蘭州境內柔河地區（*Mukin Johol*）的 *Temuan* 人的十個村落，*Temuan* 人是非伊斯蘭的原始馬來人（Proto-Malays），同樣依循著屬於她們的母系 *Adat* 系統。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 *Temuan Adat* 實踐在日常生活中的再現，透過此以企圖對 *Temuan* 社會有更好的理解。在這個研究中不只重視 *Adat* 文本的研究更強調 *Temuan* 人如何解釋與如何操作他們的 *Adat* 系統，換句話說這個研究強調來自於日常生活實踐的地方意義，除此本研究也將彌補過去對於 *Temuan* 族群認識的不足給予深度的民族誌描述，加深對馬來西亞這個多元文化族群國家的討論，並以此為未來與台灣南島語族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

二、研究背景

馬來西亞是一個以多元族群文化自許的國家，在整個馬來半島上除了馬來人、華人與印度人等主要三大族群之外，尚有為數不到總人口百分之一，約近十萬人的原住民 (*Orang Asli*)，這些原住民可分為 *Negrito*、*Senoi*、*Proto-Malays* 等三大類十八個族群，其中 *Negrito* 包括 *Kintaq*、*Kensiu*、*Jahai*、*Mendriq*、*Batek*、*Lanoh* 等族群，主要居住在馬來半島北部，過著採獵的生活總人口約二千多人。*Senoi* 約有三萬七千多人，包括 *Semai*、*Temiar*、*Jah Hut*、*Semaq Beri*、*Chewong*、*Mah Meri* 等族群，主要居住於中央山脈的高地，過著游耕的生活。*Proto-Malays* 包括 *Temuan*、*Semelai*、*Jakun*、*Orang Kanaq*、*Orang Kuala*、*Orang Seletar* 等族群，居住於馬來半島南半部的淺山地區。

本計畫所研究的對象 *Temuan* 人即是原始馬來人中的一個族群，屬於南島語系，因其語言、風俗近似馬來人，且居住於淺山地區，與馬來、印度、華人等三大族群有較大的互動，其社會位置也就擺盪在其他原住民與馬來人之間。*Temuan* 是原始馬來人中較大的一個族群，總人口約有一萬五千多人，分部於雪蘭莪 (*Selangor*)、森美蘭 (*Negeri Sembilan*) 等州的淺山地區。在西方早期的觀察者紀錄這個族群分別使用 *Mintra*、*Biduanda*、*Belandas* 或者 *Jakun*、*Sakai* 來稱呼，一直到 1970 年代官方才正式使用 *Temuan* 來稱呼這個族群。

雖然在英國殖民時期已有不少官員學者對馬來半島原住民進行研究 (如 W. W. Skeat、C. O. Bladgen 等)，然而現代人類學對 *Orang Asli* 的研究則遲至 1960 年代開始，如 Robert Dentan (*Semai*/1965)、Geoffrey Benjamin (*Temiar*/1967)、Kirk Endicott (*Batek*/1974)、Hood Salleh (*Semelai*/1978)、Signe Howell (*Chewong*/1984)、Baharon Azhar (*Temuan*/1974)、Wazir Jahan Karim (*Ma'Betisek*/1981) 等人，至 1980 年代由於學術研究轉向於工業化、發展等議題，傳統原住民議題漸為學者所忽略，直到 1990 年代國際原住民運動興起以及本地學者的加入，半島原住民的研究才有了新的著作 (Lye Tuck Po 1997; Juli Edo 1998; Colin Nicholas 2000)，但仍為數甚少。在整個半島原住民的研究中，大多集中於 *Senoi* 與 *Negrito* 等居住於中央山脈的族群，而居於淺山地區的原始馬來人則較為被忽視。

對於 *Temuan* 這個族群而言目前並無專書的研究作品，除了極少量的介紹性文章外，唯一完整性的研究是 Baharon Azhar 在 1970 年代的博士論文。Baharon Azhar 的研究是針對 *Jelebu* 區內的 *Parit Gong* 村落所進行的，主題在

探討村落的轉變，然因其研究主要在一個村落內進行，缺乏對整個 *Jelebu* 區域做完整性的討論，但仍是至今我們了解 *Temuan* 人的唯一憑藉。在本計畫研究的柔河地區遲至今日並未有學者進行研究，這也是本計畫得以受到馬來西亞政府原住民事務部 (JHEOA) 的重視與支持的原因之一。因此除可加深對 *Temuan* 人的認識外，藉由 *Baharon Azhar* 的研究亦可進行比較以及了解 30 餘年來 *Temuan* 社會的變化，進而從 *Adat* 實踐的課題則更能反映 *Temuan* 社會在整個森美蘭州社會結構中的角色，以補充過去研究的不足。

森美蘭州是以母系社會著名的馬來西亞十一個州屬之一，人口約有 573500 人，居民主要是來自蘇門達臘米南加保人的移民後裔，在這些移民抵達此地之前已有包括 *Temuan*、*Semelai*、*Jakun* 等今天稱為原住民的族群生活於此，因此居住於淺山地區的原住民與移民有很長的互動歷史，也有不少敘述著早期原住民與移民的關係的傳說故事流傳著。森美蘭州的原住民中只有 *Temuan* 人是依循母系 *Adat* (*Adat Perpatih*) 且與整個州的 *Adat* 體系有密切關係，柔河地區是森美蘭州內九個小州屬之一 (*Negeri Sembilan* 的馬來文原意即是九州的意思)，也是四個為原住民族群統治的地區，其族長 (*Dato Batin*) 傳統上擁有很大的權利不僅統治著柔河地區，也在整個森美蘭州馬來蘇丹的政治體系上有重要位置。

柔河地區的 *Temuan* 社會位於森美蘭州的西南部臨接著麻六甲州的淡邊區 (*Mukin Tampin*)，是由十個原住民村落所組成，分別是 *Kampung Tering*、*Kampung Spg. Tering*、*Kampung Air Rengas*、*Kampung Senibai*、*Kampung Air Runtuh*、*Kampung Air Pulasan*、*Kampung Air Lerek*、*Kampung Charik*、*Kampung Kelapi*、*Kampung Bari* 等十個村落，這些村落位於各個山谷之間，每個村落相距約為十至三十分鐘的車程。柔河地區的 *Temuan* 人主要經濟來源是來自於割膠，賣膠所得，在不下雨的早上，大部分的人得到膠園工作，這部分的工作主要是屬於男性的，而女性的工作除了家庭事務外，也要負責果園的整理。每日的飲食除了米必須購買之外，其他的大多來自於大自然，男性負責打獵，女性則是採野菜。因為食物來自於大自然，可以任何時間去取得，儲藏的概念並不強。差不多在同一段時間，可以在不同的家裡吃到同樣的東西，或者是打獵而來的山產 (諸如猴子、山豬、小鹿等)，或者是自製的糕點如炸香蕉。因為他們對大自然是分享的態度，所以必須分享各種食物給其他人。這個分享從其鄰近家屋開始，鄰近家屋通常屬於同一個家系，由母系親屬關係所組成的 *Temuan*

家系不但是這個社會的基礎，同時也是 *Temuan Adat* 實踐的開始。

三、研究內容與理論觀點

當我們去問 *Temuan* 社會如何組織起來的這樣的問題，首先必須檢視的是每個 *Temuan* 人所屬的家系 (*Perut*)，在柔河地區每個 *Temuan* 村落約有十五至二十個家戶，分屬於二至四個家系。根據 *Temuan Adat*，家系之內與家系之間的通婚有嚴格的規定，而婚姻關係也使得村落與村落之間的家系緊密結合，由此透過親屬關係將整個 *Temuan* 社會構成一個親屬網絡，每個個人可以在這網絡中找到其對應位置。這個網絡所構成的階序關係稱為 *Adat Pangkat*，嚴格的通婚規定也是在使這個階序關係不產生混淆，除了上下代的關係外，因出生順序也構成平行間階序的高低，並進而產生整個家系的高低。舉例來說，若母親是長女，阿姨的小孩的階序都是比你低的，不管她們的年齡的高低，以此往下延伸整個家系內子孫的階序都是高的。階序的高低在婚姻上有差別，在日常生活中最明顯的是階序低者不能稱呼階序高者的名字，而必須代之以階序排行名。此外不同家系所能繼承的 *Pangkat* 頭銜，因 *Temuan* 是母系繼承，所以這些男子繼承的頭銜則是傳給姊妹的兒子，其順序也是依著家系階序的高低來選擇。這些頭銜包括 *Batin*（治理整個區域的族長）、*Menteri*（族長副手）、*Jenang*（溝通村內與村外間的事務）、*Jekerah*（工作時召集與分配人手）、*Panglima Mehitam*（監督關於 *Adat* 事務）、*Panglima Meputih*（*Mehitam* 的副手）、*Kano*（負責山林開發、煮食等），在 *Temuan* 社會裡正是這些擁有 *Adat* 頭銜的人負責日常生活事務，他們也是記憶、傳承、實踐 *Adat* 的主要人物。

其次，必須檢視的是各種儀禮，諸如婚姻、葬禮、祭祖、過年……等等，這些儀禮均依循著 *Adat* 的規則，但在實踐過程中又有詮釋與討論的地方，因此必須實際觀察；除了這些儀禮之外，日常生活中的許多觀念，如分享、勤勞工作、禁忌等，其背後隱藏的也是 *Adat* 的思想。*Temuan Adat* 的知識儲存於各種儀禮之內，在日常生活中這些知識透過儀禮的實踐表現，這個表現是一種再現的過程，*Temuan Adat* 經由這樣一次次的再現傳承 *Temuan* 社會文化。

Adat 作為馬來世界傳統文化價值的核心，大致上來說，馬來半島上有兩種 *Adat* 系統，兩個系統分別給予了馬來人生活上的指引，其一是以母系親屬（*matrilinal kinship*）結構所建立的森美蘭州，稱為 *Adat Perpatih*；其次是其他州屬的雙系親屬（*bilateral kinship*）系統的 *Adat Temenggung*。前者因其傳

統的蘇丹政體是基於整個母系氏族而建立，時至今日整個森美蘭州仍是在這樣的 *Adat* 系統之下，不只是在蘇丹政體的政治結構，也在一般人的生活婚姻，特別引起重視，因此大部分關於 *Adat* 的研究也集中於此。

對於 *Adat* 的研究有幾種研究取向，早期研究 *Adat* 的殖民官員，諸如 R. J. Wilkinson、E. N. Taylor、C. W. C. Parr 與 W. H. Mackray 等人，主要是對 *Adat* 文本的收集與整理，傾向於將 *Adat* 視為習慣法，尋求了解殖民地土地繼承、通婚規則、蘇丹行政體制等 (Hooker 1970；1972)，這樣的研究取向把 *Adat* 視為法律條文只重視文本卻忽略了 *Adat* 實際操作的複雜性。其次，將 *Adat* 視為舊的、傳統的習慣，探討傳統與伊斯蘭的關係 (Taufik 1966) 或者檢視 *Adat* 在現代化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 (Stivens 1996；Peletz 1988：303-325)；近來人類學家轉向於文化系統的研究，特別女性主義的研究取向，也帶動了母系社會的性別研究，這些研究中或者探討母系特質 (Sanday 2002)，或討論權力網絡 (Blackwood 2000) 均增加我們對 *Adat* 的認識，也不在依靠文本，而是檢視文本如何產生，在村莊內 *Adat* 如何被實踐的等議題。

Temuan 人如何了解 *Adat* 知識？*Temuan Adat* 的基層來自於一個母系親屬組織，透過 *Adat* 的日常實踐把整個 *Temuan* 社會組織起來，然而 *Temuan* 人並不會時時把這些 *Adat* 規條放在嘴邊，雖然不少的 *Adat* 法則是依著口傳的諺語被流傳下來，但事實上這些諺語是抽象或象徵的，無法單靠諺語就能明瞭。舉例來說，*Pulang Tudung Periouk* 這句諺語字面意思是把鍋蓋蓋回去，但其在 *Adat* 的意義是指家系內的男性成員因婚姻關係隨妻居於其他地區，其後他的男系子孫與家系內的成員婚配，重新回到家系之內。如果未配合人們記憶中的各種經驗，沒有人們的再詮釋，單純的文本是不足以研究 *Temuan Adat*。

再者 *Adat* 並非如法條一般不可改變，事實上當事情發生時，人們才根據過往的經驗來處理、解釋，這個解釋雖然是依循著過往經驗，但實際上是一次新的再現，這樣的 *Adat* 有很強的日常生活實踐的意涵，也因此對 *Temuan Adat* 的研究不只從文本著手，同時也要從日常生活中去觀察。舉例來說，某男的祖母與某女的祖母是姊妹，根據 *Adat* 這對男女是不能結婚，如果我們只將 *Adat* 看成是習慣法，將會得到這樣的結果。但實際上，還是有這樣的例子結婚的，人們還是必須解決這樣違反規則的婚姻，其結果是違反 *Adat* 的婚姻除了必須繳交一定的罰金，還必須請巫師進行特別的淨化儀式，此外再規定這對結婚的新人以後是不能離婚的，於是這就成了新的 *Adat* 規則。但萬一他們一定要離婚

呢？有了之前的經驗我們一定會問這樣的問題，事實上如果真的發生了、*Temuan* 人還是可以依據討論而產生新的解決之道，因為 *Adat* 不僅是親屬法則也是日常生活知識，是跟著日常生活不斷學習不斷更新的。日常生活的特別在於它沒有特出之處，總是被忽略，但卻是生活中最大的一部分，這些日常生活知識是沒有書寫文本的教科書，它的素材來自於日常生活發生時，來自於大自然，也來自於與外在世界的接觸。這些大者如婚姻禮俗，小者如何製作吹箭、如何上毒藥等都是一點一滴在日常生活中明白，他們在每日的生活中看著年長者如何做，或是親身操作學習，整體的 *Temuan Adat* 精神也就這樣植根在每一個 *Temuan* 人的心中。

在這個研究中，我將 *Adat* 視為一種慣習、價值系統、實踐的生活知識。首先它架構了一個秩序，使每一個 *Temuan* 在此秩序下有其位置；其次它提供人與人之間互動與各種儀禮的規範；第三經由日常生活的實踐，*Temuan* 人學習 *Adat* 知識、操演 *Adat*，也是 *Temuan* 文化的再生產。*Temuan* 社會由 *Adat* 所連結的親屬網絡使整個社會緊密整合也加強了 *Temuan* 人的社會認同，使得居住在淺山地區與其他三大族群錯居的他們，能夠不斷的延續他們的文化。因此 *Adat* 作為其日常生活知識不僅給予 *Temuan* 生活上的指引，也隱藏著一代代 *Temuan* 人的文化，這也是為什麼本計畫要通過 *Adat* 的研究來認識 *Temuan* 社會，在這個研究中，我檢視各種文化儀禮的呈現，重新思考 *Temuan* 人如何解釋他們的 *Adat* 文本，進而探討 *Adat* 的地方意義以及 *Temuan* 文化的再生產。

四、結語

台灣的人類學與區域比較研究中的一個主要弱點是對本土之外的其他社會與文化缺乏長期的研究 (Bosco 2004: 210-212)，這樣的結果造成台灣的社會科學研究始終停留在以漢學研究為中心的課題，缺乏對其他民族文化的了解，無法進行對話，為了彌補這樣的缺失，進行長時間的海外其他族群文化研究必須要開始。

經過一連串的申請過程，我在 2003 年底取得馬來西亞政府發出的研究許可，得以進入原住民村落進行研究，隨後在柔佛地區進行一年多的田野工作。這一年我居住在村落裡，成為族長的養子並與他們共同生活，從作為 *Temuan* 人的朋友到學習成為一個 *Temuan* 人。主要完成十個村落的系譜、人口資料普查，並紀錄多次的婚喪儀禮以及過年、拜年等，藉由每日跟著村人生活，也讓

我認知到村人日常生活知識。

對於一個外國人進行馬來半島原住民的研究確實有其困難性，這個研究有幸得到馬來西亞政府的研究許可、原住民事務部的支持以及柔河地區所有 *Temuan* 人的幫助（特別是我所屬的家系），讓我得以完成田野調查。本計畫的完成除了對 *Temuan* 人與馬來半島原住民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補充過去研究的不足，在理論上也希望能對日常生活知識的研究有所貢獻，此外也作為我們了解另一個南島語族的基礎。

參考書目

- Azizah Kassim. 1976. A Matrilineal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Development: the *Adat Perpatih* Case. *Federation Museums Journal* (N. S.), 21: 41-52.
- Baharon Azhar bin Raffie'i. 1973. Parit Gong: an Orang Asli community in transition. Ph. D. thesis, King's College, Cambridge.
- Benjamin, Geoffrey. 1967. Temiar Religion. Ph.D. The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 Blackwood, Evelyn. 2000. *Webs of Power: Women, Kin, and Community in a Sumatran Villag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 Bosco, Joseph. 2004. Local Theories and Sinicization in the Anthropology of Taiwan. in Shinji Yamashita. Pp. 208-252 in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eds. Joseph Bosco and J. S. Eades. New York & Oxford: Berghahn Books.
-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rey, Iskandar. 1976. *Orang Asli: The Aboriginal Tribes of Peninsular Malaysi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rsten, Janet. 1997. *The Heat of the Hearth: The Process of Kinship in a Malay Fishing Commun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ntan, Robert Knox. 1965. Some Senoi Semai Dietary Restrictions: A Study of Food Behavior in a Malayan Hill Tribe. Ph.D. Thesis. Yale University.
- Endicott, Kirk. 1974. Batek Negrito Econom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Ph.D.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 Endicott, Kirk. 1979. *Batek Negrito Religion: The World-View and Rituals of a Hunting and Gathering People of Peninsular Malays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Geertz, Clifford. 1983. Local Knowledge: Fact and Law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167-234 in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 Gomes, Alberto. 1982. *Ecological Adaptation and Population Chang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mang Foragers and Temuan Horticulturalists in West Malaysia* (Research Report No. 12) Honolulu: East-west Environment and Policy Institute, East-west Center.
- Gullick, J. M. 2003. *A History of Negeri Sembilan*. Kuala Lumpur: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 Hood, Salleh. 1978. *Semelai Rituals of Curing*. Ph.D. Thesis. Oxford University.
- Hooker, M. B. 1970. *Readings in Malay Adat Law*.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 1972. *Adat Laws in Modern Malaya: Land Tenure, Traditional Government and Religion*.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well, Signe. 1984. *Society and Cosmos: Chewong of Peninsular Malaysi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sselin de Jong, P. E. de. 1951 (1965). *Minangkabau and Negri Sembilan: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 in Indonesia*. Leiden: Ijdo.
- Juli Edo. 1998. *Claiming Our Ancestors' Land: An Ethnohistorical Study of Seng-oi Land Rights in Perak Malaysia*.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RSPA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Lye, Tuck Po. 1997. *Knowledge, Forest, and Hunter-Gatherer Movement: The Batek of Pahang, Malaysia*.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Hawaii.
- Nicholas, Colin. 2000. *The Orang Asli and the Contest for Resources: Indigenous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Identity in Peninsular Malaysia*. Copenhagen: International Work Group for Indigenous Affairs, Subang Jaya: Center for Orang Asli Concerns.

- Peletz, Michael G. 1988. *A Share of the Harvest: Kinship, Property, and Social History among the Malays of Rembau*.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anday, Reeves Peggy. 2002. *Women at the Center: Life in a Modern Matriarch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tivens, Maila. 1996. *Matriliny and Modernity: Sexual 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 in Rural Malaysia*. Sydney: Allen & Unwin.
- Wazir Jahan Begum Karim. 1981. *Ma'Betisek Concepts of Living Things*. New Jersey: The Athlone Press.

「遷移、文化與認同： 緬華移民的社群建構與跨國網絡」博士論文簡介

翟振孝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本院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學員

一、計畫摘要

社群人口的空間移動，是近現代顯性的社會現象之一。人類學家關注移民現象，起因於傳統田野地點的轉變，研究典範屢有更迭，無論是採取古典的推拉模型，抑或世界體系的勞力市場操控取向，多偏重探究移民的動機、形式、適應與同化、移民與家鄉聯繫等議題為主要核心。我的博士論文研究除了延續碩士期間探討台灣中和地區緬華移民社群文化的接續性發展，另沿循移民遷動路徑之源起與去向，以跨國散居於緬甸及加拿大多倫多地區的緬甸華為人為研究對象，透過跨國三地（台灣、緬甸、加拿大）多元田野的觀察，探究現今分別生活在不同主體族群社會中（即台灣社會、緬甸社會及廣義的西方社會），同是作為「非主體族群」的緬華移民，在歷經人群與地域、原屬文化的解離，遷移路徑如何影響其文化構成與展現？如何模塑社群認同？分散各地的成員透過何種形式維持與來源地及彼此間的連結？又將形成何種型態的跨境網絡？換言之，本計畫將探討跨越地域空間的人群流動與重組過程，人群聚合的機制以及背後的資源流動網絡，作為跨地域人群連結的新理解。

二、研究背景

位於台北縣中和市南勢角的華新街及鄰近區域，有為數眾多來自緬甸的華人移民聚居此地，他們開設各式專賣滇緬風味的飲食店，販售泰緬食品的雜貨鋪，緬文書報與影帶出租店，經營緬甸珠寶生意的銀樓以及緬甸玉佛雕刻店等櫛比相鄰。此外，亦有由緬華移民禮請緬籍法師來台講道所成立的南傳佛教（Theravada Buddhism）弘法會，一年中除依照緬曆節慶舉行法會外，並不定期為個人進行沙彌度僧或化解厄運等宗教儀式。這種種獨特的文化表現，與

周圍地區形成異國風貌的鮮明對比，與當地有所接觸的台灣本地居民，通常稱呼此地為「緬甸街」。我自 1994 年 3 月開始接觸這群聚集在中和地區的緬華移民社群，作為碩士論文的研究對象，由成員內部文化生活以及與外在社會的接觸經驗，討論該社群具有豐厚的族裔特質（諸如宗教、食物、衣飾、美學物質使用、語文及音樂等），並據以在情境變化的過程中產生新認同，進而分析出他們是一「處於形成過程中的族裔群體」（ethnic group-to be）（翟振孝 1996）。

在我完成碩士論文的翌年，4 月中旬的一個假日晌午，部分成員自發性地在華新街舉辦「中和緬甸潑水節」，於巷道口搭建臨時性的表演舞台，以往僅限於少數人的小型潑水活動，如今躍然登上舞台，台上接力演出緬甸歌舞，交織著台下的瘋狂水仗，讓人恍如置身緬甸新年的街頭。這次充滿異國風情的節慶演出，引起當地市公所的高度關注，隔年即擴大規模舉辦，以期吸引廣大的本地民眾參與，在縣政府官員及民意代表們身著緬甸傳統服飾舉行開幕儀式中展開，不僅緬寺的法師們應邀出席為眾人誦經祈福，演出的緬甸歌舞更加豐富多元。為此，參與演出的緬華舞者們平日即自組舞蹈團練習，並遠從緬甸「家鄉」學習舞碼並採購相關表演服飾道具，以期展現「傳統」緬甸文化樣貌。同時，縣政府在「一鄉鎮一特色」的文化政策推動下，於 2001 年首次將「中和潑水節」正式納入「台北縣文化曆」，使其成為二十九個鄉鎮中獨有的文化風貌（台北縣政府 2001）。我透過長期參與觀察這群聚居在中和的緬華移民，發現他們不再是台灣社會中一個隱而未現的族裔群體，而正逐步邁向族群展演的舞台（翟振孝 2004）。

另一方面，基於碩士論文的研究理解，華人自西北陸路或東南海路往來於緬甸的歷史長遠，而聚居在中和地區的緬華移民，在緬甸社會生活長則三、四世代以上、短則一、兩代的華人，多數係因 1960 年代軍政府一連串的反華活動而迫使向外移居來台（翟振孝 1996：32-35）。因此，我追溯移民遷動的路徑，於 2001 年年底首次踏上緬甸國土，多次由南向北分別到仰光（Yangon）、曼德勒（Mandalay，又稱瓦城）、密支那（Myitkyina）等地進行田野調查，藉以探究華人在緬甸貫時限及地域性的文化面向。居住在下緬甸的仰光華人，多數籍貫為福建及廣東，大部分聚集在市中心區廣東大街的南北兩側，和印度裔住民比鄰而居。¹在大街兩旁緊密地排列各式商家與金舖，販售華人日常用品及食

¹ 華區（*tayoudan*）與印度區（*galadan*）大致以二十四條街為界，以西為華人聚集中心，以東則是印度人密集區。

物，區域內並興建有廣東觀音亭、福建媽祖宮等華人寺廟，不同省籍、邑屬的宗親同鄉會或家姓團體散布於巷道間，在華區內不同省籍的華人尚有分區居住的現象。²日常飲食除了家鄉口味之外，華人也擅長煮食以魚露、蝦醬等調味的緬甸菜式。此外，華人彼此在語言溝通上，除了長一輩曾接受過華文教育，年輕一代多以緬語溝通。相對地，居住在曼德勒以北的上緬甸，以雲南籍華人為多數，其日常生活習俗及節慶儀式多數仍維持華人傳統，以熟悉的形式過著類似於「家鄉」的生活。整體而言，華人雖然在衣飾、飲食、語言及風俗等方面呈現出不同程度的緬甸特質，但絕大多數的緬甸華人仍抱持有「在緬甸的中國人」作為自我的定位與歸屬（翟振孝 2005a）。近十多年來，緬甸政府對外政策較為開放，多數華人亦有親友在國外求學、工作或移居，時常有友人回到緬甸探親、觀光或貿易投資，國際接觸經驗顯然更甚於以往。

在緬甸發生反華事件後，約在 1970 年代北美亦放寬對於緬甸移民的申請，此時有部分華人向外移徙來到加拿大，也有緬華在來到台灣之後再次移居，逐漸聚集在東岸多倫多市。於是我循著移民遷動的去向在 2004 年 10 月進行田野調查，發現他們雖置身於中區唐人街，但主觀上自認為有別於當地同屬祖裔的加拿大華人，早期以「旅加緬甸華僑」稱呼自己以及共組的團體，其中隱含有視加拿大為客居地、而緬甸為其「家鄉」的意涵，這也具體表現緬華移民對於自我界定的理解。此外，在宗教性生活方面，緬華移民亦自行禮請緬甸法師來此地講道，歷經多年由散居在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加等地區的信徒捐獻集資，終於在 2004 年 6 月於市郊區購地建造完成一座緬甸式的南傳佛教寺廟，由來台的緬籍法師們三地輪流住持。社群成員中除了有來自台灣、緬甸的華人移民與緬甸人之外，尚有鄰近的斯里蘭卡、泰國、寮國等國的移民們，他們在移居到加拿大之後，基於彼此共享的南傳佛教信仰而聚合為一群體，而該座緬寺也就成為加東地區東南亞裔移民共同的宗教信仰中心。此外，緬華移民又結合後期來自緬甸的難/移民，以「緬裔加拿大人」標記著彼此共同的來源地與現居地，在參與安省所舉辦的多元文化節慶活動時，聯合其餘東南亞國家自願性社團共同展現亞洲的異國風情（翟振孝 2005b）。

透過上述跨地域聚集在台灣、緬甸及加拿大三地的緬華移民社群的多元田野觀察，我初步發現當今分別生活在不同國族一國家，同是作為「非主體族群」

² 早期廣東籍華人多數居住在上段（即廣東大街以北）的各橫街之中；而福建籍華人則是聚集在下段（廣東大街以南）的區域中，彼此少有混居情況。

的他們，在緬甸社會展現的是「華人」特質；當他們再次「回流」到以華人為主體的台灣社會，展現的卻是「緬甸」文化表徵；而在廣義的西方社會則以南傳佛教作為「泛東南亞裔」移民共享的文化質素。這些緬華移民歷經了群體與地域、文化的解離，遷移路徑究竟如何影響其文化構成與變遷？如何模塑社群認同的展現？人群聚合依恃何種機制運作？而散居各地的成員如何維持與來源地及彼此間的連繫？其中人口、資本、商品、資訊的流動又將形成何種型態的移民跨國網絡？這些均是我在接觸緬華移民前後逾十年的田野經驗中，持續欲探究的核心議題。

三、文獻回顧

（一）人類學的移民研究

人類學傳統以人口學量性分析為基礎，對於遷移議題著重探討與文化生態的關係、移民適應，以及移民在城市的調適等（李亦園 1980：424-431）。此外，有關族群意識或族群性（ethnicity）研究興起的原因之一，亦主要受到近現代在北美及西歐等白人主體世界中，非白人裔移民永無止息的遷入影響，因而族群研究在處理此一議題上，尤以探究移民裔群的生活適應、律法、社會不均等、文化變遷、及祖國與移入國家認同的矛盾等問題最為熱門（謝世忠 2000：1）。換言之，人類學的移民研究，往往與社會發展、族群意識、性別關係、移民網絡等主題相結合，以進行移民群體的文化適應、社會組織形式、族群意識與族群變遷等質性議題的探究（Brettell 1996：793，2000：98，2003；Kearney 1986，1995）。

人類學移民研究的典範屢經更迭，由早期探討移民類型為主的推拉模式（push-pull model）為古典遷移理論，學者認為透過類型分析可以清晰反映出移民的原因、動機以及決策機制（Jackson 1986：13-14；Brettell 2000），但易流於簡化而無法真實呈現複雜因素交錯運作過程。此外，移民研究亦受到現代化理論及全球資本主義影響，例如大／小傳統的城鄉連續體理論（folk-urban continuum model），或是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將人口流動視為具有全球化的力量，或是受到全球化勞力市場操控的結果（Wolf 1982；Brettell 2000），然而卻無法有效地解釋人口漂移現象，早在資本主義出現之前即已存在的事實。因此，相對於資本主義或世界體系強調移民的被動角色，另有學者提出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分析取向，著重移民在遷移過程中的能動性，

不僅在跨越地理、政治與文化疆界的領域中運作，重新建構其新生活及認同，也和移出國家之間維持連繫，縮短彼此的社會距離（Schiller, Basch and Szanton Blanc 1999；Brettell 2000；Kearney 1995）。換言之，我們若採由跨國主義觀點來看，移民將不再是「失根」的（uprooted）、與地域文化脫節的，而可以是自由往來於不同國界、文化及社會體系間，對於移出社會帶來經濟性及社會性的衝擊與改變，反映當代時空的轉變（Brettell 2000：104-105）。

Michael Kearney (1986) 另在有關人類學的全球化與跨國主義回顧研究中指出，人口、資本、商品、資訊及符號等在全球及跨國的空間中流動，將引發社群成員的認同變遷。研究者不同於以往以固定性、地方性社群作為分析單位，轉而以非定著的、穿透性的全球空間，重新思考社群的本質為何？個體如何成為社群的一份子（如 Appadurai 1991；Kearney 1995；Gupta and Ferguson 1997）？人口流動造成的文化接觸，如何使社群周邊游移並形成邊界文化（border cultures）（如 Alvarez 1995；Kearney 1991）？而跨國移民如何運用其對於地方的記憶（memory of place），想像性建構新的認同與歸屬？換言之，全球化視野下的移民研究，若由文化主位觀之，著重的是移民的調適與適應問題；而由文化客位觀之，則是關注移民在移入社會的整合過程。

（二）離散裔群與認同建構

針對當前人口流動規模之大、跨地域連繫幅度之廣的現象，在以「Diaspora」為名的跨國主義研究期刊創刊號中，Khachig Tölölian 表示「Diaspora 原意是指涉離散異邦的猶太裔群體，係一典型的跨國移動。其後，除了描敘猶太裔、希臘裔、亞美尼亞裔的離散裔群之外，亦用以指稱近似語意的群體，如：移民、流亡者、難民、外籍勞工、流亡社群、海外社群、族裔社群等」（Tölölian 1991：4-5，1996）。換言之，離散強調的是一種離鄉背井、易地而居的移動經驗（experience of replacement），在原生家鄉之外另建家園的過程（construct homes away from home），因此往往與跨文化接觸（transculturation）、邊界、流動（travel）、文化混成（hybridity）等概念連結（cf. Clifford 1994，1999：245-247）。

William Safran 亦在同一份刊物中發表專文表示，「diaspora」可被界定為「流散的少數社群」（expatriate minority communities），係一「自原初『核心』向『邊陲』散居的歷史過程，仍維持關於家鄉之記憶、想像與神話，未能

完全為移入社會所接受，視祖裔家鄉（ancestral home）為最終回歸的地方，並保持與家鄉的關係與支持，成員彼此間擁有集體認同與凝聚力量」的群體（Safran 1991：83-84）。在此認定下，如亞美尼亞、土耳其、巴勒斯坦、古巴、希臘、波蘭、華裔群體等，均包括在離散裔群的範疇內（Clifford 1999：247）。由此可知，離散裔群與移民的概念相比較，著重的不僅是人口四散的遷徙流動，更是移出者與家鄉社會跨越時空界限的連繫。

在多數學者的論述中，均提及華裔作為離散族裔群體（Chinese diaspora）的事實認定，主張百年來華裔已形成類似於非裔加勒比海人（Afro-Caribbean Diaspora）、南亞印度裔（South Asian Diaspora）等跨地域散居群體。傳統上人類學對於「海外華人」社會的研究，向來存有兩種研究理念：一是將海外華人社會視為中國本土社會的延伸（如李亦園、郭振羽 1985；Freedman 1963；Skinner 1979）；其二是視為華人離開中國祖籍地後，在居留地本土化的歷程（如曾玲、莊英章 2000）。而在研究取向方面，一為著重華人在海外社會的文化展現，關注華人是否同化的議題（如李亦園 1970；吳燕和 1985；Freedman 1966；Skinner 1957，1960）；其二是從華人的親屬制度、政治團體及經濟活動等社會面向，探討華人生存適應的機制（如 Freedman 1958；Crissman 1967；Skinner 1966；Watson 1975；Wertheim 1964；施振民 1976；陳志明 1990；陳祥水 1991，1993；黃道琳 1986；麥留芳 1985，1990；童元昭 2000，2002；葉春榮 1993；謝劍 1980，1981 等）。

近年從全球化及跨國主義角度出發，「海外華人」研究轉向政治經濟及跨國分析，探討華裔族群全球性遷徙散居、認同及文化重組等議題。換言之，在全球化及跨國主義的脈絡下，所謂的「海外華人研究」已擴展成為「華裔離散群體」的討論，研究對象不再僅是華人社群與當地社會文化體系、或區域研究的互動，進而是跨國或是全球視野的參照（Ma and Cartier 2003）。如 Aihwa Ong 與 Donald Nonini 等人（1997）討論二十世紀晚期華裔離散群體，伴隨資本主義而有文化多樣性的發展，重新檢討華裔跨國主義（Chinese transnationalism）與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ed）之關連性。他們主張以「離散華裔研究」（diaspora Chinese studies）取代特定時空意涵下的華僑研究及俗成的海外華人研究之侷限，藉以去除將華人社會視為中國本土社會之延伸，使其具有相對文化主體性（Ong and Nonini 1997：5-9）。由於研究觀點的轉變，華裔群體不再被視為孤立社群，封閉且保守地與主流社會抗衡，相對是與來源

地保持接觸連繫，重視的是各散居社群(diasporic communities)之間的往來，維持彼此的網絡關係，以對照於過去研究著重個別移民社會離開母國在海外的發展適應(如 Liu 1997; Lee 1997; Hsing 1997 等)。

(三) 社群想像與跨國族群景觀

文化與認同的創造，往往發生在不同群體的接觸區域。傳統移民研究典範重視的是同化與適應融合，而跨國移民研究則強調歷史性、跨區域、跨國的相遇與交纏。在地方與跨國力量交互影響下，移民尤其重視與「家鄉」(homeland)的連繫，由於人口流動所造成的離散及混成認同，其中摻雜了對於傳統、地域、家國的想像與記憶。在全球化的視野下，跨國移民的「家」(home)的意像是如何被建構的？地域是否為構成一個社群的必要因素？它是實質的抑或是想像的？如何建構出一個超越實際地域範圍的社群共同體？便成為研究者須進一步思索的課題。

Benedict Anderson 在 *Imagined Communities* 一書中，探討國族主義源起與散佈，將「國族」(nation)定義為「一個政治性的想像社群」，闡明國族主義乃是由想像而得的特殊文化產物，同時透過印刷媒體等的傳播，使不同地區的人們得以透過想像結合為一個共同體(Anderson 1991)。他認為範圍比成員直接或間接接觸的初形村落(primordial villages of face-to-face contact)更大的所有「社群」，都是想像而來的。所謂的一體感，並非實際接觸過的人群，而是透過想像促使社群不再只是一地域性群體。而區別不同社群的基礎，即在於它們被想像的「方式」(style)，是在怎樣的社會脈絡下被想像或呈現出來？誰是想像者？而想像的基礎為何？換言之，社群的想像(imaging of community)，是我們瞭解被研究者建構與再現他們「過去」及「傳統」的重要媒介(Hobsbawn 1986)，同時也是形成集體認同與歸屬情感的基礎(Kearney 1995: 557; Clifford 1999: 9; Schiller et al. 1999: 79-83)。

Arjun Appadurai (1991) 亦指出當代社會以流動性、非地域化(nonlocalized)為特質，包括移民、難民、流亡者、臨時性勞工、觀光客以及其他形式的移動性人群(moving groups)，正共同構成我們現居流動世界(shifting world)的族群景觀，此時族群不再是緊密地域化的、有明確空間範疇的、歷史性無自我意識的、或文化同質性的群體。對此現象，Appadurai提

出「跨國族群景觀」(ethnoscape)³概念，取代「整體」文化觀念（如村落、社區、地點等）。他認為人群和地域不必然存有關連，它可以是一跨越地域的人群集結，亦即每個人散佈在相異的時空中，但仍存有彼此一體的認同感知。對此，Appadurai特別強調「去地域化」與「想像」兩個概念，他認為「去地域化」促使地理隔閡不再是人群區別的主要因素，而「想像」透過大眾傳媒之「再現」(representations)強化與根源的連繫，成為社會生活中的嶄新力量（Appadurai 1991：197-199，1996）。

四、多元田野研究

我的博士論文以多元田野的實踐方法（Marcus 1995），進行跨國移民研究，將當代生活在跨國三地的緬華移民，以其族群性展現（例如在緬甸社會展現的「華人」特質，在台灣社會中「緬甸」表徵的展演，而在加拿大社會則以南傳佛教作為「泛東南亞裔」移民共享的文化質素），以及背後的跨國網絡關係（如人口、資本、商品、資訊等的流動）作為研究焦點，探究社群成員在流動過程中跨國、跨地域產生的認同變遷，進而理解個體與社群間的關連性，社群的性質為何，而社群界限又如何建立。

我的多元田野在中和地區部分，以參與觀察緬華移民持續性的文化展現，深度探究「中和潑水節」的出現，對於社群內部成員的影響，節慶展演對於社群對外關係的變化，活動安排的主導權在於社群內部抑或是政府部門，透過展演活動緬華移民與家鄉的連繫，以及與散居於其他地區的緬華裔群建立何種連結網絡。經由訪談社群中主要團體的核心成員，與日常情境中接觸的報導人，分析此一在台灣社會突現的文化複象。在緬甸田野部分，我分別在仰光、曼德勒、密支那等地，參與觀察華人聚集區域的日常生活並蒐集華裔移民史料，在氣候方面正是涼季進入熱季時分，而在雨季來臨之前正是舉行各項慶典活動的高峰，並可同時參與華人農曆新年與潑水節緬曆新年。我居住於華區並在群體聚集的社團及廟宇活動，就近觀察當地華人生活面向，並走訪華人家庭訪談其遷移史，以及蒐集相關舊照片及族譜等文獻資料。此外，在加拿大田野部分，我在多倫多市緬華移民社區研究，時為緬曆的結夏安居節，各項儀式活動均在緬寺中舉行，正可深入觀察該地區移民社區與緬寺互動的宗教生活，並進行家

³ Appadurai點明當前世界的族群風貌為離散族群景觀，類同於地景(landscape)概念，即對於人群構成組合的感知與意識（Appadurai 1991）。

庭移民史及個人經驗的深度訪談，與其餘東南亞裔移民生活狀況與遷移歷史的瞭解，並探究不同族裔群體之間的互動模式。

我將研究主題聚焦於跨國三地緬華移民展演活動的三個面向，一是社群對外的展演，如中和緬甸潑水節、緬甸華人節慶儀式活動、多倫多市的東南亞文化週等；其二為社群對內的展演，如緬寺的宗教性生活、華校的華文教育、社群節慶活動等；其三則是日常生活實踐，包括：人口、宗教儀式專家、華文／緬文刊物、商品、資金等的流動網絡，此亦是後續資料分析與論文撰寫的主要方向。

五、研究意義

以往研究對於移民的界定，總認為他們是「失根」的，背離家園而投向陌生移居社會文化的同化過程。然而，近來學者主張跨國移民日常生活即維持多元且跨國境的互動連繫，他們的認同通常是多於一個國家的多元複選；他們並非「過客」，而是整合於當地的政治、經濟、生活中，同時和移出社會保持連繫（Clifford 1999；Schiller et al. 1999：73）。換言之，將人口流動、「居住在行旅中」的人群視為常態，在經歷移動、住居、跨國往來的複雜經驗與歷史，他們的「根源」即存在於「路徑」中，文化的接觸與流動只是一連串旅途中的邂逅，應是比較合宜的理解方式。正因如此，置於跨國族群景觀下的分析，對於離散裔群將有一更具有彈性及流動性的討論。

我的博士論文研究以緬華移民為研究對象，將研究視野置放於當代全球化情境中，結合族群與展演理論作為理解大陸東南亞社會文化的切入點，不僅限於東南亞華人，而以跨國移民為研究關注，期望跳脫傳統模式而另開啟一較符合社會事實的研究取向。而移民研究的具體成果亦不僅限於研究對象本身，一旦不將移民視為「失根」的形象，而重新思考遷移對於社群重組、文化建構、成員認同的作用，以移民研究作為概念反思的切入點，將可對於學科傳統認定的人群、地域、文化等概念進行釐清。換言之，本研究從研究區域而言，現今華文世界少有從事大陸東南亞國家且以緬甸為主體的人類學研究；就研究對象來看，多數「海外華人研究」均以「生活在非華人世界裡的華人社群」為討論對象，而少有人類學者關注到「海外華人」再次移居到華人或非華人主體社會中，而成為一屬性特殊的另類華人社群；在研究主題方面，常見以社會結構、親屬制度、宗教、經濟、社會文化變遷等作為研究議題，但對於從文化經驗與

文化展演為出發而探討認同觀點，或以社群想像與文化認同作為人群建構基礎則較少見；另就田野方法而言，則由單一田野地點邁向多元田野觀察的民族誌研究，以切合當代社會情境。由於類似此跨國移民的研究相對地比較缺如，故本研究或可提供在既有的「海外華人」或移民研究領域的一項另類觀察。

參考書目

- 李亦園。1970。《一個移殖的市鎮：馬來亞華入市鎮生活的調查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乙種，第1號）。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1980（1974）。〈文化人類學的人口研究〉。收於李亦園編：《文化人類學選讀》（修訂三版），頁417-443。台北：食貨出版社。
- 李亦園、郭振羽。1985。〈海外華人社會研究叢書總序〉。收於李亦園、郭振羽主編：《東南亞華人社會研究（上）》，頁I-III。台北：正中書局。
- 吳燕和。1985。〈巴布亞新幾內亞華人百年史：1880-1980〉（海外華人社會研究叢書之七）。台北：正中書局。
- 施振民。1976。〈菲律賓文化的持續：宗親與同鄉組織在海外的演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42：119-206。
- 陳志明。1990。〈華裔和族群關係的研究：從若干族群關係的經濟理論談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9：1-26。
- 陳祥水。1991。《紐約皇后區新華僑的社會結構》。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1993。〈紐約市皇后區華人移民小商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6：97-136。
- 黃道琳。1986。〈加勒比海區域的華人：其移入及適應的過程與特徵〉。收於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二）》，頁327-348。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 麥留芳。1985。《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乙種，第14號）。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1990。〈方言群的分化與整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9：27-44。
- 童元昭。2000。〈大溪地華人的歷史敘事與「國家」認同〉。《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54：41-62。

- 。2002。〈固定的田野與游移的周邊：以大溪地華人為例〉。收於陳文德、黃應貴主編：《「社群」研究的省思》，頁 303-329。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曾玲、莊英章。2000。《新加坡華人的祖先崇拜與宗鄉社群整合：以戰後三十年廣惠肇碧山亭為例》（清華人類學叢刊三）。台北：唐山出版社。
- 葉春榮。1993。〈人類學的海外華人研究：兼論一個新的方向〉。《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5：171-201。
- 翟振孝。1996。〈經驗與認同：中和緬華移民的族群構成〉。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2004。〈中和緬華移民社群、文化與節慶展演〉。《北縣文化—中和專輯》，80：64-80。
- 。2005a。〈祖裔、地域與文化展演：近半世紀東南亞緬甸華人的社群建構〉。發表於「2005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論文研討會」，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主辦，國立暨南國際大學，4 月 28-29 日。
- 。2005b。〈加拿大多倫多緬華移民的生活場域與社群建構〉。發表於「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第一屆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培訓計畫成果研討會」，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主辦，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11 月 19 日。
- 台北縣政府。2001。《台北縣文化曆》。台北縣：台北縣政府文化局。
- 謝世忠。2000。〈國族—國家、共同體、與解構：泰中兩國的少數族群人類學社群關係研究〉。發表於「『社群』研究的省思：跨世紀台灣人類學的展望之一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台北南港，11 月 2-4 日。
- 謝劍。1980。〈自願社團與文化持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25-147。
- 。1981。《香港的惠州社團：從人類學看客家文化的持續》。香港新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Alvarez, Robert R. 1995. The Mexican-US Border: The Making of an Anthropology of Borderland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4: 447-470.
- Anderson, Benedict. 1991[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Appadurai, Arjun. 1991. Ethnoscapes: Notes and Queries for a Transnational Anthropology. Pp. 191-210 in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 ed. Richard G. Fox. Santa Fe. New Mexico: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 _____.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Public Worlds, Volume 1*. Minneapolis &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rettell, Caroline B. 1996. Migration. Pp. 793-797 in *Encyclopedia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3*, eds. David Levinson and Melvin Ember. New York: American Reference Publishing Company.
- _____. 2000. Theorizing Migration in Anthropolog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Networks, Identities, Communities, and Globalscapes. Pp. 97-136 in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eds. Caroline B. Brettell and James F. Hollifield. N. Y.: Routledge.
- _____. 2003. *Anthropology and Migration: Essays on Trans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Identity*. Walnut Creek, California: Altamira Press.
- Brettell, Caroline B. and James F. Hollifield. 2000. Introduction: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Pp. 1-26 in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eds. Caroline B. Brettell and James F. Hollifield. N. Y.: Routledge.
- Clifford, James. 1994.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9(3):302-338.
- _____. 1999.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rissman, Lawrence W. 1967. The Segmentary Structure of Urb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Man*, 2(2):185-204.
- Freedman, Maurice. 1958. *Chines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Singapore*.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 _____. 1963. 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4(1):1-19.
- _____. 1966.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 Longer View. *Asian Review*, 3(1):24-44.

- Gupta, Akhil, and James Ferguson, eds. 1997. *Culture, Power, and Place: Explorations in Critical Anthropolog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Hobsbawn, Eric and Terence Ranger, eds. 1986.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sing, You-Tien. 1997. Building Guanxi Across the Straits: Taiwanese Capital and Local Chinese Bureaucrats. Pp.143-164 in *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eds. Aihwa Ong and Donald Nonini. N.Y. & London: Routledge.
- Jackson, John Archer. 1986. *Migration*. N. Y.: Longman.
- Kearney, Michael. 1986. From the Invisible Hand to Visible Feet: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5: 331-361.
- _____. 1991. Borders and Boundaries of State and Self at the End of Empire.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4(1):52-74.
- _____. 1995.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The Anthropology of Glob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ism.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4: 547-565.
- Lee, Ching Kwan. 1997. Factory Regimes of Chinese Capitalism: Different Cultural Logics in Labor Control. Pp. 115-142 in *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eds. Aihwa Ong and Donald Nonini. N.Y. & London: Routledge.
- Liu, Xin. 1997. Space, Mobility, and Flexibility: Chinese Villagers and Scholars Negotiate Power at Home and Abroad. Pp. 91-114 in *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eds. Aihwa Ong and Donald Nonini. N.Y. & London: Routledge.
- Ma, Laurence J. C. and Carolyn Cartier, eds. 2003. *The Chinese Diaspora: Space, Place, Mobility, and Identit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 Marcus, George E. 1995. 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4: 95-117.

- Ong, Aihwa and Donald Nonini, eds. 1997. *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N.Y. & London: Routledge.
- Safran, William. 1991.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 1(1): 83-99.
- Schiller, Nina Glick, Linda Basch and Cristina Szanton Blanc. 1999. From Immigrant to Transmigrant: Theorizing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Pp. 73-105 in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ed. Ludger Pries. Aldershot; Brookfield, Vt. : Ashgate.
- Skinner, G. William. 1957.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6(2): 237-250.
- _____. 1966. Overseas Chinese Leadership: Paradigm for a Paradox. Pp. 191-207 in *Leadership and Authority: A Symposium*, ed. Gehan Wijeyewarden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 _____. 1979. Introduction. Pp: xi-xxiv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 ed. G. William Skinn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ölölian, Khachig. 1991. The Nation State and Its Others: In Lieu of a Preface. *Diaspora*, 1(1): 3-7.
- _____. 1996. Rethinking Diaspora(s): Stateless Power in the Transnational Moment. *Diaspora*, 5(1): 3-36.
- Watson, James L. 1975. *Emigration and Chinese Lineage: The Mans in Hong Kong and Lond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ertheim, W. F. 1964. The Trading Minorities in Southeast Asia. Pp. 39-82 in *East-west Parallels*. The Hague: Van Hoeve.
- Wolf, Eric. 1982.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NGO to Local NGO – TOPS/KAKO in Cambodia

Jung-Yuan Lee

MA Student, Department of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Work,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and MA Student Research Grants of CAPAS

Background and Purpose

Poverty, lack of employment, poor education, ill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often interact to make sustainable improvements in the lives of millions of peopl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xtraordinarily difficult.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significant long-term change may require joint action by many different actors – grass-roots group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private corporation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who together have the local and foreign knowledge and resources required.

Foreign aid adoption by governments and NGOs began after World War II, and has included “disaster relief” and “development”. The former is intended as short-term aid, while the latter refers to long-term and grassroots activities. Nowadays the role, content, and emphasis of foreign aid vary according to time, and are also influenced b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ince the UN has launched its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 the UNDP, as the UN's global development network, links and coordinates global and national efforts to reach the Millennium goals. UN Secretary-General Kofi Annan has asked UNDP Administrator Mark Malloch Brown, in his capacity as chair of the UN Development Group, to be the coordinator of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in the UN system – to make the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UN's work worldwide.

Through the UN country teams, the worldwid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leads efforts to help countries integrate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into their national development frameworks. Countries are tailoring the MDGs to national circumstances, building them into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and incorporating them into budgets and ministries' priorities. The goals are also integrated into assistance frameworks and programs. For more than 70 of the poorest countries, the main strategic tool is a nationally-owned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which relates to national budgets, development activities and other assistance frameworks.

Another group implementing developmental programs,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GOs), also plays a main role in filling some of the gaps, by gathering goods and services left by market and government failures. "Foreign Aid" has become a protocol, or another part of foreign policy, for establishing an inform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ries. Taiwan is also involved in this process.

As for myself, why did I choose this topic for research? Because when I was a student in college there was a course about foreign aid issues offered as part of the graduate program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and I took this class just as an auditor. This course gave me a wide-open vision of the process of foreign aid. Additionally, some of the students in this class had work experience in this area. They shared so much practical experience with every one of us which inspired my imagination. This course not only gave me an introduction to foreign aid but also led me into a semi-real world of the process of foreign aid. However I image the situation should be, I still desire to have a chance to go abroad to experience it. At that time, I thought that I was so fortunate to be able to discuss many of the issues with experienced workers, that is, my classmates. It made me think deeply, and also pushed me to prepare myself to greet the coming chance. I continued to develop my imagination.

In the summer of 2004, the Taipei Overseas Peace Service (TOPS) gave me a chance to do an internship as an overseas volunteer, and so I went to Cambodia alone from Taiwan via Ho Chi Minh City for my internship. For me it not only seemed like an adventure but also a wonderful personal experience. What is the situation in Cambodia now? What can I do for this organization or the people in rural areas whom our organization serves? Can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or knowledge of social work and public health which I learned in school be used in this period of my internship? And how widely can I apply them? Although I got so much information while preparing for the internship, I still asked myself those questions again and again when departing for Cambodia. After over twenty years' commotion as a result of *colonization, invasion*, the rule of the *Khmer Rouge*, and the *civil war* of Cambodia, what a really pitiful era the people have lived through in the past years. It was time for me to face and feel the real situation in Cambodia. The first impression was hot, hot and hot when I got off the aircraft, and I felt that I could hardly breathe in such hot air.

It was hard to imagine how an organization from Taiwan with just a few personnel could help some poor people in the rural areas, even though it was to become a local organization. There are 15 villages, which are our responsible target, and this organization offers several kinds of services to satisfy villagers' needs at different age levels. Busy is hardly the word to describe my situation when I was there because I had so many ideals and wanted them to be realized. TOPS was phased out in 2001, and the TOPS Cambodia team was registered as a local NGO, the Khmer Akphiwat Khmer Organization (KAKO),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maintaining all the projects. All the work must continue because it is the belief of TOPS and KAKO. The story is continuing and will never end. There seems a necessary reason to do it.

In this research, there are two types of transformation going on at the same time: an INGO transforming into a local NGO, and program transformation. A Taiwanese organization playing a role as an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GO) with the intention of helping foreign people in their own territory, has now become a local NGO. As we know there are many aspects involv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However,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only a few aspects, especially at the interaction level. The main aim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 Interactions between KAKO and Other Sectors

The researcher would like to observ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KAKO and other sectors in this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Other sectors would include other organizations, the local authority and villagers. What kind of interactions and how frequently interactions with those sectors take place, and who has more influence or who can induce influence will be described in this research.

(2) Collaboration Network Reform

The researcher aims to identify how KAKO enhances or reforms the network to collaborate with other NGOs, governments, and other groups and sectors. This aim is associated with purpose 1 because KAKO would be based on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sectors when it tries to change its collaboration network. It relates to what resources and assistance KAKO can access, and to what extent the members of this network can act together.

(3) The Role of TOPS Taipei in this Transformation Process

The researcher aims to identify the role of TOPS Taipei in this transformation process. After 2001 when TOPS was phased out from Cambodia, TOPS Taipei continued to fund KAKO. However TOPS is not only a funder but has also continued its relationship with KAKO in these years because TOPS believes that helping KAKO in this process is also its responsibility.

The researcher intends to spend at least half a year staying in KAKO, and getting involved for a part of this period in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The researcher would have dual roles: both observer and participant, and both roles can be regarded as a learner to me. In addition, I expect that I can really do something for this organization while carrying out this research.

No matter how much help I can give KAKO, I know both KAKO's staff and myself will experience much growth in this time.

In my opinion, valuable research should not just be research; it must be a process of learning, teaching and empowerment to each other, and als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both the academic and practical fields. However, the research must firstly benefit the participants in order to advance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tangible or intangible. All the influences will continue but we do not know what the outcome will be or when it will appear. I really hope that this research can relate back to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help draw them into global issues and solutions. In a word,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not just to do research, but to go with them in this hard time.

Literature Review

There are four sections. Firstly, the conditions of INGOs will be defined to present an outline of the operation of INGOs in the worl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nature of INGOs will also be stated in this section. Secondly, a brief history of Cambodia will be presented, in order to make sense of the past in Cambodia and explain why so many NGOs have derived from there, and also entered the country. Thirdly, it will narrow down the focus to the conditions of NGOs in Cambodian territory (does this mean "the conditions of NGOs in Cambodian territory"?), as well as illustrating the numbers and types of NGOs there are in Cambodia and what they do there. Finally,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literature review presents the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interactions associated with how KAKO has implemented and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is transformation process.

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is a not-for-profit, voluntary citizens' group, which is organized on a local,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level to address issues in support of the public good. Task-oriented and made up of people with a common interest, NGOs perform a variety of services and humanitarian functions, bring citizens' concerns to governments, monitor

policy and program implementation, and encourage participation of civil society stakeholders at the community level. They provide analysis and expertise; serve as early warning mechanisms and help monitor and implement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Some are organized around specific issues, such as human rights, the environment or health. The World Bank defines NGOs as *“private organizations that pursue activities to relieve suffering, promote the interests of the poor,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provide basic social services, or undertake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e failure of both markets and governments in Africa and in other Third World countries to deliver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contributed to the rapid growth and expansion of NGOs/INGOs on the continent. All NGOs and INGOs share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dependency on donor funding, the need for self-financing, transparency or accountability to donors and clients, and targeting the needy or marginalized segments of the population or operating in various sectors of society depending on the needs to be met, as well as resources available in the local community. By 1993, there were an estimated 28,900 INGOs worldwide, with approximately 20,000 of these in Third World countries. In 2000 there were 45,674 INGOs in the world. The growth of the INGOs on the global scen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changing attitude of the international donor community about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creasingly, a large number of INGOs in the Third World are funded by a small number of donors such as the World Bank, the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and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

There are over 500 NGOs in Cambodia.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from CCC (2004), we can classify all of these NGOs into five types: international NGOs (INGO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Os), Cambodian NGOs (local NGOs), other organizations, and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s (UNOs). According to the publication of Cooperation Committee for Cambodia (CCC) there are 147 INGOs, 296 Cambodian NGOs (local NGOs) and 13 UNOs in Cambodia.

Organization is defined as rational co-ordination of the activities of a number of people for the achievement of a common explicit purpose or goal, through division of labour or function and through a hierarchy of authority or responsibility. No doub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among interaction,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when discussing on inter-organizational level. In this section, the main content of interaction,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are defined. The government-NGOs relationship is particularly dynamic and complementary, and is similar to the relationship of inter-organizations, local government and NGOs, as well as NGOs and the people who receive any kind of help from that NGO. Special-purpose organizations take over various social functions, such as economic production, policing, education, political action, and so on, at different rates in different societies.

The configurations of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re necessary for the formation of organizations in the first place, and the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 can be easily conceptualized. Then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how the environmental “enters” organizations by mean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linkages through the use of networks and other mechanisms.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the environment at the time of organizational formation is critical for the form that the organization takes and that this form persists over time. That may be an oversimplification. The content of the environment includes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legal conditions, political conditions, economic conditions, demographic conditions, ecological conditions, cultural conditions, and others.

The general sense to a consideration of the specific organizations in contact with one another is through with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IORs). The relationships of any single organization with its environment take place through the actions of other organizations—organizations affect organizations. Individuals as well as organizations are affected by IORs. A common practice is client referral. Theoretically, if one agency is unable to provide the needed services for a particular client, the individual is referred to an appropriate agency for service. The most difficult cases sometimes

eventually “fall between the cracks” of the referring set of organizations. Individuals are affected by IORs, for example how many projects and services an organization like KAKO can offer to the clients or the villagers we serve will depend on how many resources this organization can obtain.

In this transformative and transitional period, not only the NFE program is in a transitional situation but so too is the organizational nature. KAKO must build other capacities for gathering resources from other areas. The “Capacity Framework” can provide a common vision and vocabulary for nonprofit capacity, and also for NGO capacity. The capacity framework defines capacity building in a pyramid of seven essential elements: three higher-level elements—aspirations, strategy, and organizational skills, three foundational elements—systems and infrastructure, human resources,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a cultural element which serves to connect to others.

Methodology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 is an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local problem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tentative solutions with local stakeholders. It makes use of a wide range of visualization methods for group-based analysis to deal with spatial and temporal aspects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t mainly deals with a community-level scale of analysis, but is increasingly being used to help deal with higher level, systemic problems.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 is also a label given to a growing family of participatory approaches and methods that emphasize local knowledge and enable local people to make their own appraisal, analysis, and plans. PRA has much in common with Participatory Research (PA) and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PAR). PRA uses group animation and exercises to facilitate information sharing, analysis, and action among stakeholders. Although originally developed for use in rural areas, PRA has been employed successfully in a variety of settings. The purpose of PRA is to

enable development practitioner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local people to work together to plan context appropriate programs.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 is also a participatory method that aims to empower people by encouraging them to analyze their problems, devise solutions and act on them. The services implemented by KAKO have already contained some ideas of PRA because they involved so many groups working together. Under these conditions all the people participating can gain some useful experience. Moreover, KAKO may still need to be more positive in working with other sectors.

The researcher aims to identify the real conditions of operation within an organization that is classified as a foreign aid organization in forming its own network among other sectors, and how is KAKO facing this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What are the barriers in this process, and how can these two organizations, TOPS and KAKO, work together to overcome them? The researcher will become involved in a period of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This process is dynamic and interactive, and it is therefore suitable to use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 for observation and to record the process. PRA will be described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The main research questions are as follows:

- (1) What are the barriers, assistance, and solutions of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sectors involv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How can KAKO face them?
- (2) What methods should KAKO use to reform or enhance its network for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NGOs, governments, and other sectors?
- (3) What is TOPS' role in this transformation process?

According to this research, I prefer to adopt three methods for data collection. Those are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field notes, formal and informal interview, and documents review. Transformation process must be dynamic that is why researcher should use complex methods for data collections. It is no doubt to use these three methods for collecting data necessarily, as well as they have been mentioned by PRA because PRA emphasizes integrative methods when doing research.

Implications

This research would provide hints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which INGOs operate, interact and collaborate at an inter-organizational level. No matter what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may be, it is hoped that all of these outcomes can uncover some previously unknown factors.

This research has some implications for KAKO. Although it is just a part of the record for this transformation process in the early stages, and researcher is not able to stay there until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ocess. As for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local NGO, this research may provide many useful experiences which can be referred to by other organizations. For local NGOs,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a lesson for other organizations when they handle interaction with others or enact strategies for adjustment. Organizations can learn about both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of the process when reading this research, then apply these to themselves. Thus some useful hints or guidance can be provided for other local organizations.

For TOPS Taipei, be an international INGO how to let foreign force to be localization, and push foreign station transform to a local NGO will become the target for achievement. In this period how TOPS Taipei set up the process for newborn local NGO. This research is also a record for TOPS Taipei, recording what it has done and what it is going to do in this early stage of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KAKO. The efforts and ideas of TOPS Taipei and KAKO will be a reference for other TOPS's foreign stations or branches.

In the academic field, this research is just a fundamental study for organizational studies. It offers some practical experience to other scholars, and then accumulates those resemblant studies to build up some concepts or principles. In addition, those principles or concepts should be transferred from the academic to the practical field to maximize its academic value. Moreover, this research may raise some questions for further studies in the field.

「層疊型區域主義在亞太地區的實踐： 以自由貿易區的建構為例」碩士論文簡介

徐郁芬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本專題中心九十四年度碩士論文獎助得獎人

在國際關係研究中，以區域主義(regionalism)為題的研究文獻實數不盡，特別是在後冷戰時期或者是後九一一時期的今日，區域主義的發展更是迥異於從前的傳統邏輯。本論文研究之旨趣，即針對晚近區域主義之發展型態進行一學理上之梳理，並期望透過此一學理回顧與亞洲經驗之對話，進一步建立一系列用以觀察亞洲新一波區域整合(regional integration)過程的分析架構。

回顧歷史，區域主義的發展依其內涵大致可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或型態：其中，第一波區域主義始於1950年代的歐洲整合運動，起因於當時飽受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摧殘的歐洲各國，西歐諸國希冀透過國際合作的制度化以追求和平共榮之目標。當時的努力歷經了半個世紀後，現已成就出頗具規模的歐洲聯盟(EU)。除了歐洲地區，1960年代以後則有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開發中國家所從事的區域整合運動。在亞洲區域中，於1967年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在冷戰兩極對立結構中成立，成為亞洲地區在戰後推動區域整合的動力之一。到了1990年代，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的成立，期望結合美、加、墨等各具特色的經濟體，進而提升國際競爭力。諸如此類的區域整合活動，大多強調會員國之間透過功能面之合作，建立區域層級之原則與規範，以期創造經濟成長與增加競爭力。整體而言，以上數個區域中所進行的跨國合作，清楚地勾勒出第一波區域主義發展的樣貌。

第二波區域主義的發展，係起始於1989年後所成立的亞太經合會(APEC)及其所推動之泛區域整合運動。此一囊括泛亞太地區會員國的區域組織，所強調之區域整合原則，實有別於第一波區域主義的內涵。在分析上，本論文擬以亞洲整合運動之環境脈絡的特殊性作為切入點，先與歐洲和美洲之相關整合過程進行比較，並進一步分析亞洲地區的區域主義發展過程的特殊因素。由於亞洲各國在歷史背景、政治制度及社會文化上因深具特殊性，因此致使亞洲區域

之整合速度緩慢；此一多樣性更倍增其整合之難度。事實上，亞洲區域整合選擇透過較為鬆散、或者「非正式」(informal)之方式進行，此種獨特性顯示在區域組織運作方式中，例如，亞太經合會所強調的「共識」、「彈性」與非排他性的「開放性區域主義」即深具特色。晚近在亞太地區極為特殊的整合系絡中，出現了一波又一波的自由貿易協定洽簽風潮，而此一區域貿易合作的實踐是否為亞洲區域整合的內涵加入新的元素，實為本文亟欲探討的重點。

在此要特別注意的是，上述兩波區域主義的內涵實非相互排斥，其相異之處僅在於各自所強調之不同的整合重點，以及所訴諸之不同組織運作特色。另外，晚近有關第二波區域主義（又稱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之研究，大多以亞洲區域作為探討與分析之對象，而亞洲地區之整合運動因深具特殊歷史系絡與多元動態發展等兩大特色，亦引起了筆者的研究興趣，希望能深入探討在此特殊背景下的整合運作形式。

本文主要以自由貿易協定的建構作為後續分析的經驗案例，作為探討第二波區域主義演進的切入角度。早期對自由貿易區的研究多將重點置於經濟層面的討論，尤其特別聚焦於合作的議題範圍（issue-areas）以及制度設計的貿易創造效果。論者大多認為自由貿易區籌組的主要動機是為了追求更龐大的經濟效益，因此大多認為整合的程度將可能僅會停留在經濟層次上。不過，若以一個更全觀的區域架構來觀察自由貿易區的發展，不難發現諸如 Helge Hveem 等從事新區域主義途徑（NRA）研究邏輯的學者的主張將更為適用。相關學者認為全球化（globalization）其實是基本的「經濟」過程，而區域化（regionalization）則被視為是對全球化的「政治」回應，旨在促使經濟國際化能夠依附在政治目標之下（Hveem 1999）。循此邏輯，本文嘗試以 Helge Hveem 等學者之觀點檢視亞洲自由貿易區所特有的各種「非經濟因素」與新區域主義之本質間的種種關聯？並進一步探討上述因素如何對區域內的整合進程與國家行為造成影響？

是故，本文除了比較分析第一波與第二波區域主義的差異之外，更關注的是，從區域內自由貿易協定的發展觀察第二波區域主義現下的動態發展脈絡與型態為何。從歷史演進的角度來看，所謂的第二波區域主義乃出現於 1980 年代末期的東亞一帶。而影響第二波區域主義內涵最為關鍵的結構因素，即為全球化浪潮所導致的金融危機，迫使亞洲國家思考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機制，以避免金融危機再度發生。在晚近一波的區域貿易合作過程中，該結構性因素致使

亞洲區域整合不單僅藉由追求功能性的外溢效果（spill-over）來達成更深層的整合目的；更導致亞洲區域選擇透過提倡「亞洲認同」來強化整合基礎——也就是藉由集體認同的建立，建構出區域內的政治菁英們在應付外來震盪時的集體反應方式。爰此，我們可以發現在早期區域主義的理論化（theorizing）過程中鮮少出現的兩個變數——區域認同的理念和外來挑戰的催化作用——在新一波的區域主義發展過程的理論化系絡中，更顯關鍵（Breslin, Higgott and Rosamond 2002：5）。針對此，本文將納入上述兩個因素，結合區域內的權力競逐以及自由貿易協定所帶來的經濟利益等影響力，嘗試尋求一個重新詮釋新區域主義在亞太地區如何實踐的分析架構。

從本論文的分析中可以發現，相對傳統區域主義強調避免過度依賴國際貿易體系的內向（inward-looking）性質，新區域主義則被賦予了外向性與開放性的特色。相對於推動傳統區域化過程的西方國家而言，亞洲國家傾向不以正式的建制（regime）訂定具約束力的規程，反而訴諸於尊重個別文化與國情，嘗試以非正式和漸進的調解來達成共識性的決議（Ravenhill 2001）。透過這兩個差異——區域主義的性質與區域合作的過程，我們得以發現，亞洲國家經濟結構與政治影響力的多元分歧，佐以文化因素的交錯影響，豐富了新區域主義的結構與內涵。再更深入觀察，新一波區域主義形成的動力，往往源自區域的內在自發力，同時兼具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目的；因此各國會依循不同的政治經濟目的，透過多元參與或籌組區域組織，來建構出多重、複雜甚至複合重疊的現象。除此之外，該現象亦導致新區域主義下的區域組織之發展，不只限於單純的政治性安全同盟或是經濟性關稅同盟，而往往發展為兼具政治、經濟、文化多重目的之全面性區域組織（郝培芝 2004）。如此具有亞洲式特色的區域合作模式或區域主義之發展，就 Peter Katzenstein 的觀點而言，其實正是所謂的「網絡形式的整合」（network-style integration）（Katzenstein 1997：3）。值得玩味的是，這一套區域化模式是否僅為亞洲所獨有？而區域內為數眾多的雙邊（bilateral）及多邊（multilateral）自由貿易協定又如何促使新一波區域主義內涵之改變？根據亞洲自由貿易區的建構狀況，我們實該深思深入分析各國對經濟利益、政治權力與文化認同上的權衡，並檢視此一極具特殊性的亞洲區域主義之演進。

本論文認為，自 1980 年代末期開始發展的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在學理基礎與實踐邏輯上均隱含著一個極為重要的特色，而該特色實與晚近亞

洲區域整合所秉持之「外向式區域主義」(即亞太經合會所揭櫫的「開放」原則)有所關聯。直至 1990 年代,亞太地區的區域主義發展受到各種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協定洽簽風潮的影響,並且在 1997 年所發生之金融危機的衝擊下開始有了更新一波的重構現象。此一重構過程徹底改變了亞洲區域整合之圖像,從而形塑出本文所謂的「層疊型區域主義」(nesting regionalism)之區域合作型態。在此同時,除了合作型態上的改變,亞洲地區之區域主義內涵上亦開始有了一些調整,例如,某些自由貿易區的倡議似乎已超越了單純的經貿合作,從而進一步朝著囊括經濟、安全、社會文化等更為多元的共同體願景發展。就此,亞洲地區或亞太區域內將同時出現在範圍、內涵與策略上均有所不同的共同體倡議,例如東協自由貿易區與東協共同體、東協加三自由貿易區與東亞共同體。晚近所發展的諸多倡議,在在揭櫫了在研究亞太區域主義或自由貿易協定之發展上的複雜性與多元性,從而亟需一套全觀的分析架構進行學理與經驗上的整合。爰此,本論文嘗試透過比較研究途徑與歷史制度途徑之分析邏輯來檢視亞洲區域整合與新區域主義理論的發展過程,以期對亞洲區域整合的運作型態有更深入的瞭解。透過學理上與實務上之分析,本論文深切期待能建構一套層疊型區域主義之邏輯,用以探討亞太地區特有的區域化過程以及區域主義發展型態,為晚近區域主義的理論化過程略盡棉薄。

參考書目

- 郝培芝。2004。〈亞歐會議形成的結構性動力與意義：從新區域主義的觀點分析〉。《問題與研究》，43（1）：125-144。
- Breslin, Shaun, Higgott, Richard, and Rosamond, Ben. 2002. Reg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190-203 in *New Regionalism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ies and Cases*, eds. Shaun Breslin, Christopher Hughes, Nicola Phillips and Ben Rosamon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Hveem, Helge. 1999. Political Regionalism: Master or Servant of Economic Internationalization? Pp. 85-115 in *Globalism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eds. Björn Hettne, Andrá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 Katzenstein, Peter J. 1997. Introduction: Asian 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1-44 in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eds.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London: Cornell.
- Ravenhill, John. 2001. Does APEC Make a Difference? Trade, Regimes, and Compliance," Pp. 134-185 in *APEC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acific Rim Reg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從後殖民角度探討馬來西亞的國族論述」 碩士論文簡介

楊詩評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本專題中心九十四年度碩士論文獎助得獎人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最初，政治學界研究範圍通常是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自由主義、市場機制，除非是基於國家向外擴張的需要、殖民政策上的考量，作為殖民對象的非西方國家才會引起西方政治學者的興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美蘇兩超強在冷戰中必須爭取更多國家支持，亞非國家地位日趨重要，西方國家政府紛紛提供大量經費給予學術單位，或是在大學的研究機構中設置與亞非相關的研究主題、課程，以集中資源、人才來發展，因此所謂的「區域研究」開始蓬勃發展。一般而言，政治學理論習慣以一個簡化的架構，去預測、期待東南亞國家的政治發展，也就是說，這些所謂的開發中國家會經過民主化、現代化的過程，最後這些開發中國家會邁入已開發國家之林。

但實際上，許多投入東南亞政治研究的學者發現，這些新興國家的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不如想像中簡單。本研究將範圍鎖定在馬來西亞，以後殖民角度去探討馬來西亞政治社會發展。目前，在許多針對馬來西亞政治進行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研究者習以各種民主發展的指標去衡量馬來西亞的政經發展，而忽略其社會文化、宗教與族群等歷史背景。馬來西亞自獨立建國至今，國內種族眾多，呈現和平共存、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狀態，其國內宗教、族群、文化等因素所帶來對政治的影響，使得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比想像中複雜，其政府的統治正當性不只是建立在「經濟發展」、「民主化」上，還有建立在「族群政治」之上。

循以上脈絡背景，本研究嘗試以馬來西亞的「國族論述」為分析的文本。所謂的「國族論述」不只是塑造、鞏固國族認同而已，更甚，可以成為政治工具，用來爭取政治權益、動員民眾。筆者希望藉由對馬來西亞的國族論述研究

來論證國族論述的建構是一種政治工具，可以用來維護、鞏固政治利益，更甚可以使既得利益的存在變得更理所當然。本研究將藉由薩伊德的後殖民途徑，探討馬來西亞的國族論述，以釐清馬來西亞國內各族群之間的權力關係，並探究進行統治的馬來族群如何藉由國族論述來鞏固其利益，而被統治族群如何藉由另一套國族論述來爭取政治資源。

二、問題陳述

(1) 馬來西亞的政治與其殖民歷史背景、社會文化、宗教有何關聯？曾被英國殖民統治的馬來西亞，其後殖民社會特色如何影響馬來西亞的政治現況？

(2) 馬來西亞自 1957 年脫離英國殖民統治，在立國初期採以「社群主義」的政治制度，各族群以和平解決族群利益分配的原則，互相協商。但在五一三事件之後，以巫統為首的執政聯盟，如何藉由一連串的政策實施，鞏固馬來族群的利益？加強馬來族群與其他族群之間的邊界？而華人族群如何對應，以爭取華人族群的利益？

(3) 1980 年代馬哈迪執政之後，馬來人與華人政黨領袖以及知識份子如何藉由表達國族論述來鞏固或爭取其族群利益？

三、研究途徑

(一) 族群 (ethnicity) 和「國族」(nationality)

在馬來西亞，族群不只是身分認定的問題，更牽扯到資源分配的問題。就政治上的優勢族群——馬來人而言，其利用政治上的力量分配資源，並創造馬來人所認定「國族」，以鞏固其統治地位。但是就華人而言，在經濟地位上的優勢使其對政治參與保持一定的冷漠，當國家政策以族群為分配原則之時，危及華人族群的權利之時，華人族群亦會有所行動。就雙方而言，自身的歷史、文化成為政治動員的認同來源，也因此辨別「你群」、「我群」之時，歷史與文化一再被強調以及建構，以為政治動員所用。而雙方對於基本的國家政策、國家文化也會有基本主張的不同，雙方皆希望藉由對「國族論述」的主張，以鞏固或是爭取其在國家政治結構中的地位、資源分配。

（二）後殖民論述

在建國情境之中，華人和馬來人都致力發展國家，只是「記憶」和「希望」有嚴重的分歧，也因此其對所謂的「國族」的內涵解讀也不同。本文採用後殖民途徑，將研究重點放在以馬來人為主的巫統及其政治人物，如何藉由行政體制、教育體制等各層面運作「權力—知識」的關係，利用權力在各場域再現其「國族論述」。相對的，本文亦將華人對「國族論述」的塑造放入討論的重點。

（三）社群主義

社群主義可以區分為描述性質的 *communalism* 與規範性質的 *communitarianism*。就前者而言，指涉的是馬來西亞自 1957 年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獨立建國之後，在立國初期所採取的「社群主義」的政治制度。而後者屬於政治思想研究，其強調群體文化歸屬及共同目標為立論基礎，因此一方面主張個體不可能任意拋棄形塑其自我認同的社群背景，另方面也主張承載共同歷史文化資源的人應該合力防止共同體瓦解、渙散。本研究以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爭辯，切入華人與馬來人的政治思想脈絡，其以對馬來西亞兩大族群有更深入的了解。

四、研究方法

基於上述之研究目的與內容，本研究之主要研究方法包括：

（一）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

蒐集有關之文獻與理論，以作為本研究之基本參考。而本論文所採用的文獻資料將由國內各大圖書館、中研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圖書收藏、馬來西亞當地出版品取得，其他還有馬來西亞當地報章、官方統計資料、政黨官方網站、馬來西亞憲法文獻、政黨黨章、馬來西亞各種國立博物館的圖像資料等等。

（二）論述分析法（Discourse Analysis）

關於本研究主要是著重在各族群如何詮釋「馬來西亞國族」的內容與意義。本文將針對馬來人與華人對國族的想像差異進行研究，並將雙方建構「國族」使用的論述、這些論述背後的社會歷史都將納入分析。

（三）歷史結構研究法（Historical-structural Analysis）

在文獻蒐集方面儘量多元以求接近真相，並從歷史發展的進化過程中進行分析，藉由釐清不同時期的背景、各種結構因素與不同的國族論述的關係，以分析馬來西亞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對國族論述造成的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越南之華人政策 (1945-2003)」碩士論文簡介

黃宗鼎

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台灣與亞太發展組碩士班研究生
本專題中心九十四年度碩士論文獎助得獎人

據越南計畫暨投資部(MPI)統計,1988年至2003年底,越南外人直接投資額中註冊於台灣之投資件數共有1,086件,居各國之冠,累計金額近60億美金,僅次於新加坡(Vietnam Economy 2004)。然歷來赴越投資之台商,似乎僅止於關注該國政經穩定、內需市場蓬勃,擁有優惠措施、廉價土地和勞動力,以及美國給予越南正常貿易關係(NTR)待遇等優越條件,至於潛藏在該國社會文化內之風險或障礙,台商鮮有能了然或不受其制約者。¹不論是「越尊華卑」之情狀,抑或「華人不見得能說(好)華語」之現象,皆越南陳年華人政策之貽害。本文係拙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越南之華人政策」論文大綱之摘要,謹就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等重點提報如後。

一、研究動機

(1) 越南與中國山海毗連,古來交通頻繁,華人或為謀生或為避禍,流寓至斯者不可勝數。如與其他華人移民社會相比,越南華人社會源遠流長,堪稱最為悠久的海外華人社群,是故越南華人研究於華僑華人研究、東南亞史、中外交通史,以及族群關係等領域皆有一定之學術價值。

(2) 越南華人的華語能力何以普遍低落?社會地位何以長期不振?凡此越南華人的生活樣貌,大體反映出當局的華人觀點,以及過去一段時間華人政策

¹ 王宏仁與蕭新煌在一篇題為「Taiwan Investment and Chinese Temporary Migration in Vietnam」的論文中發現,越南大部分的台商都僱用當地華裔,唯華裔所扮演的角色極其有限。第一個原因是華裔對華語的理解和表達能力不夠好,動輒令其他越南雇員誤解台商本意;第二個原因則與華裔在越南社會中「政治侏儒」的背景有關。台商委派他們為管理階層的做法,實與「越尊華卑」的主流意識形態背道而馳。在非華裔越南人可能不願聽從華裔指令,或華裔可能不願為強制執行公司指令而得咎於非華裔越南人的情況下,台商只有重整管理體系一途,但翻譯成本與勞資溝通成本卻可能超出預期(Wang and Hsiao 2002: 11-12)。

的執行結果。越南歷經君主、殖民、威權、共產政權的統治，在不同歷史階段裡，華人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他們或為當局開疆拓土的能臣，或為外交攻防的棋子，或為國家發展的障礙，或為繁榮經濟的夥伴，各政權的華人政策固有異同之處。

(3) 台灣學界目前針對越南華人政策之研究尚在初始階段，越南除外，國際間（包括大陸）專研此項議題之學者屈指可數。²Lewis M. Stern長期研究越共華人政策（1920-1988 年），其博士論文「Vietnamese Communist Policy toward the Overseas Chinese」（Stern 1984）乃越南華人政策研究之濫觴，不過，該論文缺乏分析架構，其將華人政策視為越共「統一戰線策略」一環的命題亦顯得牽強。除Stern之外，其他學者之著作皆屬短篇論文，數十年的政策變遷過程僅能摘要呈現，立論憑據相形單薄。尤有甚者，外交部與國史館現存不少與本文主題相關之檔案資料，³惜未獲重視，亟待學界開發。基於上開理由，

² 茲將同拙文相關之重要文獻羅列如後：邱文福 1995；陳鴻瑜 2005；彭天 1989；廖小健 1995；Amer 1996；Stern 1984，1988；Ungar 1987。

³ 下列資料皆為可資拙文運用之國家檔案：（1）外交部北投檔案庫藏：分類號：600.1，卷次號 0012，案名《中法關於中越關係協定》，1945/09/01-1948/08/31，冊數 1。分類號：600.12，卷次號 0042，案名《中越文化專約》，1960/02/01-1971/05/31，冊數 1。分類號：612.17，卷次號 90001，案名《越南國籍法與旅越華僑國籍問題》，1956/08/01-1956/08/1，冊數 1。（2）國史館藏：檔號：063.7，目錄號：172-1，案卷號：0500，案名《越南華僑納稅》，移轉單位：外交部，民國 35-38 年，卷數 3。檔號：062.2，目錄號：172-1，案卷號：0552，案名《越南中華會館》，移轉單位：外交部，民國 37-38 年，卷數 1。檔號：062.1，目錄號：172-1，案卷號：0554，案名《越南明鄉問題及華僑國籍》，移轉單位：外交部，民國 35-38 年，卷數 2。檔號：—，目錄號：172-8，案卷號：1138，案名《越南新政府對華僑之態度》，移轉單位：外交部，民國 52-53 年，卷數 1。檔號：—，目錄號：172-8，案卷號：1150，案名《越南華僑國籍問題與越化案之分析等》，移轉單位：外交部，民國 45-46 年，卷數 1。檔號：—，目錄號：172-8，案卷號：1146，案名《越南國籍法案資料》，移轉單位：外交部，民國 44-47 年，卷數 3。檔號：—，目錄號：172-8，案卷號：1168，案名《越南華僑幫長制度》，移轉單位：外交部，民國 35-43 年，卷數 7。檔號：—，目錄號：172-8，案卷號：1169，案名《越南政府撤銷中華理事會館》，移轉單位：外交部，民國 48-52 年，卷數 6。檔號：—，目錄號：172-8，案卷號：1241，案名《越南歧視華僑》，移轉單位：外交部，民國 44-45 年，卷數 1。檔號：—，目錄號：172-8，案卷號：1242，案名《十一種行業越化案》，移轉單位：外交部，民國 45-48 年，卷數 1。檔號：—，目錄號：172-8，案卷號：1273，案名《越南政府增徵華僑身份證稅》，移轉單位：外交部，民國 42 年 10-12 月，卷數 1。檔號：—，目錄號：172-8，案卷號：1297，案名《越南僑教》，移轉單位：外交部，民國 35-45 年，卷數 7。檔號：—，目錄號：172-8，案卷號：1303，案名《越華裔來台升學及僑校越化問題》，移轉單位：外交部，民國 49-58 年，卷數 1。檔號：—，目錄號：172-8，案卷號：1304，案名《華僑教育（越）》，移轉單位：外交部，民國 43-53 年，卷數 3。檔號：—，目錄號：172-8，案卷號：1333，案名《旅越華僑特權》，移轉單位：外交部，民國 40-46

筆者忖度「二戰後越南華人政策」一題目大有可為之處。

(4) 以往文獻多側重「越中關係」對於越南華人政策的影響，或因此偏廢了其他適足以驅動華人政策的力量，吾人今欲發掘歸納之。此外，按 Stern (1988) 所述，1986-1987 年的政策變遷似乎意味越南之「華人政策」與其「對華政策」自此脫鉤，此說是否成立？本文亦將予以檢視。

二、研究目的

(1) 筆者擬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越南華人政策為一「(從屬)族裔政策」(policies vis-à-vis ethnic subordinates)。所謂「族裔政策」，乃一國內「支配族裔」(dominant ethnic group) 按特定之「意識形態」對「從屬族裔」(sub-ordinary ethnic group) 所施用之行政、立法或司法等措施。而當局所採行的意識形態，即為該族裔政策之基調。二戰後越南當局蓋以「強制性同化」(compulsory assimilation) 或「包容」(accommodation) 的意識形態作為華人政策之基調。除意識形態以外，仍有其他導因（如國際情勢、國防安全、經濟發展、利益團體等）足以驅策越南華人政策之走向，甚至引發基調之質變，產生了以「隔離（分而治之）」或「驅逐」(expulsion) 為意識形態的華人政策。

(2) 筆者擬在闡述越南華人政策演進的過程中，分析各時期華人政策的特質，並歸納得以驅策華人政策走向的主要力量（即華人政策的導因）。

a. 就族裔政策之特質而言，「政策意識形態」的內涵自然是一項重點（究竟屬於「(強制性)同化政策」？「包容政策」？「隔離政策」？還是「驅逐政策」？），但如何對「政策意識形態」進行系統化分析，乃是關鍵所在。吾人將以「族裔互動指標」（亦即 Gordon 之「同化變項」）推導幾種不同「意識形態」取向的族裔政策的「政策原型」，復以「政策原型」作為判斷實際政策「意識形態」之準據。⁴

年，卷數 1。檔號：——，目錄號：172-8，案卷號：1334，案名《華僑自願在越軍服務》，移轉單位：外交部，民國 43 年，卷數 1。

⁴ 俾有效掌握族裔政策意識形態之脈動，於判定當局族裔政策走向時有所依循，筆者擬推論幾種不同意識形態取向的「政策原型」（意指特定意識形態下基本的、原始的政策型式）。Gordon (1964) 同化典型中提出了幾個同化變項，分別是「文化或行為（文化模式）」、「社會網絡或社會結構」、「婚姻」、「認同（民族意識或民族性）」、「態度接受（有無偏見）」、「行為接受（有無歧視）」，以及「價值和權力衝突的機制」。由於這些變項本身即是一套觀察族際關係的「族裔互動指標」，現透過「族裔互動指標」闡釋上開「強制性同化」、「包容」、「隔離」等「意識形態」概念，即可得「族裔政策原型」如下：

b.就越南華人政策之導因而言，它可能包含了政策意識形態、政體意識形態、⁵國際關係（尤其是越中關係）、國防安全、經濟發展、利益團體等。欲歸納出有效而關鍵的導因，則須把握住華人政策的路線與轉折。以越南共和國時期來說，1963 年吳廷琰政府的倒台是一個轉捩點；以越南民主共和國時期來說，60 年代起河內當局多方面自北京手中接管北越華僑資源，此階段是一轉捩點；以越南社主義共和國時期來說，1986 年六大亦是轉捩點。

(3) 為深入比較越南各政權華人政策之異同，吾人亦將考察具有不同「政體意識形態」之政權，是否可能採行相同「意識形態」之華人政策？倘若是，則其合理解釋又為何如何？

(4) 冀望將此論文之研究成果與其他東南亞國家之華人政策作一比較，藉以明瞭相關國家對華人所持立場與政策之異同。

三、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吾人擬採用「歷史研究途徑」，輔以「比較研究法」、「文件分析法（文獻分析法）」，以及「田野調查」三種研究方法。

在此重建二戰後越南華人政策編年史的過程中，筆者將同時檢視法國越南殖民政府、越南民主共和國、越南共和國，乃至於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等政權華人政策的路線與轉折，比較分析個別政權華人政策的特質與導因，從而確立 1945 年以降越南華人政策自「強制性同化（compulsory assimilation）」趨向

「強制性同化」之政策原型：(1) 迫使「從屬族裔」將原有文化模式（包括宗教信仰、禮儀習慣）改變為「支配族裔」之文化模式；(2) 要求「從屬族裔」開放其封閉的社會網絡或社會結構；(3) 強迫「從屬族裔」與「支配族裔」通婚；(4) 向「從屬族裔」灌輸「支配族裔」之民族意識或民族性，根絕其原有之族裔意識或族裔性；(5) 歧視「從屬族裔」；(6) 廢止或弱化調解「從屬族裔」與「支配族裔」權力衝突和價值衝突的機制。

「包容」之政策原型：相較於「自由主義的多元主義」隱晦族裔關係的特性，以「群體多元主義」立國者方制定具體之族裔政策。其「政策原型」大致包括：(1) 保護「邊緣族裔」之固有文化模式（包括宗教信仰、禮儀習慣）；(2) 培植「從屬族裔」發展其社會網絡與社會結構；(3) 尊重「從屬族裔」固有之族裔意識或族裔性；(4) 消弭或懲治族裔歧視與族裔偏見；(5) 建立或強化調解「從屬族裔」與「支配族裔」權力衝突和價值衝突的機制。

「隔離主義」之政策原型：(1) 壓制「從屬族裔」延續其文化模式（包括宗教信仰、禮儀習慣）；(2) 封閉「從屬族裔」之社會網絡或社會結構；(3) 禁止「從屬族裔」與「支配族裔」通婚；(4) 泯滅「從屬族裔」之族裔意識或族裔性；(5) 歧視「從屬族裔」。

⁵ 基於越南當局的「政策意識形態」確有可能與其「政體意識形態」產生背離，筆者理應將其視為兩個獨立的變數。

「包容 (accommodation)」的歷程。

參考書目

- 邱文福。1995。〈越南：華僑華人政策的調整及其影響〉。《東南亞研究》，1：49-51。
- 陳鴻瑜。2005。〈1975 年以後越南的華人政策〉收於張啟雄編：《時代變局與海外華人的族國認同》（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叢書系列 9），頁 387-421。台北：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
- 彭天。1989。〈戰後越南的華僑、華人政策〉。收於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廣州華僑研究會編著：《戰後東南亞國家的華僑華人政策》，頁 229-250。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廖小健。1995。〈戰後越南華僑華人政策〉。收於《戰後各國華僑華人政策》，頁 132-148。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Amer, Ramses. 1996. Vietnam's Policies and Ethnic Chinese since 1975. *Sojourn*, 11(1): 76-104.
- Gordon, Milton M. 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ern, Lewis M. 1984. *The Vietnamese Communist Policy toward the Overseas Chinese 1920-1982*.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 _____. 1988. The Eternal Return - Changes in Vietnams Policies Toward the Overseas Chinese, 1982-1988. *Issues & Studies*, 24: 118-138.
- Ungar, E. S. 1987. The Struggle over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Vietnam, 1946-1986. *Pacific Affairs*, 60(4): 596-614.
- Vietnam Economy <http://www.vneconomy.com.vn/>
- Vietnam Economy. 2004. Statistics of FDI by Countries. <http://www.vneconomy.com.vn/eng/index.php?param=article&catid=18&id=040105165613>
- Wang, Hong-Zen and Hsiao, H. H. Michael 2002. Taiwan Investment and Chinese Temporary Migration in Vietnam. Paper presented at "Symposium on Experiences and Challen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nd East Asia" organized and hosted by Program for

Southeast Asia Area Studies. (PROSEA) and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October 17-18.

「企業跨國經營適應機制：台灣中小型企業 在越南的掛名運作模式」碩士論文簡介

徐永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本專題中心九十四年度碩士論文獎助得獎人

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過後，台灣產業外移至東南亞有趨減緩的現象，但是最近 10 年來，前往越南進行投資的台商卻不斷的増加，在投資的件數與金額上，與日俱增。而越南政府為了鼓勵外資進入，經由投資法令的修正，也是使得台商願意將產業外移至越南做投資的重要因素。作者為了瞭解台商赴越南投資的情形，遂在 2004 年的 11 月與 2005 年 7 月有幸與指導老師前往越南，並對在越南投資的中小企業台商進行訪談與參觀工廠，在進行訪談的過程中，得知中小企業的台商在越南經營的方式，許多是以越南人頭為公司的掛名者，而實際的經營者則是中小企業的台商，這樣公司經營權與公司所有權分立的特殊現象，是吸引作者對此議題作研究的開始。

而目前針對在東南亞各國進行跨國投資的中小企業台商的研究中，並未出現類似越南中小企業台商以人頭掛名的投資型態的探討，這種特有的現象值得深入了解與剖析。人頭公司的類型存在於越南社會，主要肇因於越南的投資環境與越南台商的經營策略，適宜人頭公司的生存與經營，在越南台商的投資經營模式裡可以清楚的呈現。故作者欲將這上述兩個重要因素與族群和人際情感作結合，看能否剖析出這錯綜複雜的人頭公司成因。最後作者試圖探究越南台商的中小企業人頭公司，形成的背景因素、過程與影響；並欲藉此來探討：越南社會文化中的性別與族群關係這兩項特殊因素，如何有助於形塑越南台商中小企業人頭公司。

此外在台灣中小型企業近年來由於國內勞動力的不足、工資不斷的高漲、生產成本提升的考量之下，已漸漸的前往海外拓展新的市場。而這個市場仍以靠近台灣為主要的考量，以便與台灣作為聯繫。且東南亞的越南擁有豐沛的勞動力、生產原料與天然資源，這些條件足以吸引中小型企業的台商前往投資。而近年來，前往越南投資的台商數量逐漸增加，投資金額也不斷挹注，台商成

為越南重要的外來投資者。

目前越南在勞動力及資源的優勢上，使得我國不少中小型企業前往投資，而與新加坡和日本列為外資的前三位。台灣跨國資本不斷湧入越南，中小型企業在追求獲利的同時，作者有興趣的是這些沒有太多經濟資源的中小企業台商是如何在越南生存的？在台商東南亞各國投資的經驗指出，越南在經濟、社會、文化上的差異，使得台商和越南這不同地方的族群和性別關係所建立的網絡是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相當不同的，值得做深入的探討（龔宜君 2004）。

越南台商中小型企業的公司型態的結構中，無論是外資公司、聯營公司或是獨資公司與使用人頭作為公司經營的一個環節，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這些關係建立於管理者與掛名者角色的錯置，而這裡指陳的角色上錯置，乃是說明人頭公司的經營者與掛名者分立的情形，由於實際的經營權是掌握於台商，而台商的身份並非公司的所有人，這樣實質身份的錯置，是形成人頭公司型態的重要因素。台商人頭公司在越南眾所皆知，但其中形成的原因卻大大的不同。而人頭公司指的是越方做為人頭，台商作為實際的經營者，或是在經營的過程中，使用人頭購買土地、廠房及營業登記等等……總之只要涉及到經營上的人頭使用，就屬於本研究的範圍。

本論文會以越南台商中小企業人頭公司與當地所形成的關係，作為一個切入點，來探討中小企業台商如何使用人頭掛名開公司。其探討的內容包括：第一、台商是如何選擇到越南來的？這些台商是否循著一個人際關係的網絡，藉由人際網絡進入越南當地做投資；而在做投資生意的同時，如何建構一個尋找可信賴的人頭網絡？第二、必須分析台商會的組織是否在此時會提供一個好的人際網絡，幫助這裡的台商瞭解當地的投資環境？第三、這些台商如何選擇對本身有利的人頭，選擇的誘因為何？而台商與人頭之間的關係要如何維繫，是用正式契約、金錢借貸、情感催化、抑或是有其他的非正式的協定存在？第四、人頭的種類為何？越南華人、越南男性及女性，這之間選擇的策略有何不同，以及為何在選取的過程中，是否會隨著經營時間的長短，選擇不同的對象？此外倘若在使用人頭掛名時，發生人頭死亡或是逃跑時，該採取如何因應的方式呢？第五、人頭的使用量，是否會因為是分散其投資風險，而使用不同的人頭，作為不同用途的投資？第六、越南本地投資的法律限制問題，是否也是造成人頭公司不斷出現的原因？不過在最近幾年來，已放寬外資可投資的項目與降低投資金額的門檻，以漸漸拉近人頭公司（本地公司）與外資公司的投資差距，

但為何仍舊有人頭公司的存在呢？而仍舊不斷存在的原因為何呢？。第七、人頭公司的掛名，是否是為了找尋一個值得信任的人，而採用婚姻或是「包二奶」的方式呢？這樣的婚姻關係或是男女關係是否具有值得深入探究的地方？

最後，本論文會說明人頭公司台商的特殊性是否在於：她在異地生存時是以特殊的族群和性別關係作為台商與越南的社會、經濟和文化間，衝突與妥協過程中的中介因素。

參考書目

- 曾熾芬。1999。〈跨國投資與族群關係：印尼台商的研究〉。發表於台灣大學社會學系主辦：「台商跨國發展：經濟社會學的觀點」研討會，1月9日。
- 鄒秀明。2000。〈中小企業台商在越南投資經營模式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未出版碩士論文。
- 蕭新煌、龔宜君。2003。〈台商的歷史、性格與未來發展〉。收於蕭新煌、王宏仁、龔宜君主編：《台商在東南亞：網絡、認同與全球化》，頁11-32。台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 蕭新煌、龔宜君。1998。〈東南亞台商與華人之商業網絡關係〉。發表於僑務委員會與台灣經濟研究院合辦：「邁向新世紀台灣與東南亞華人經濟發展與互動國際研討會」，4月13-14日。
- 龔宜君。2004。〈跨國資本的性別政治：越南台商與在地女性的交換關係〉。《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5：101-140。

「東亞生產體制與社會政策的制度鑲嵌： 日本與台灣雇主角色的比較」碩士論文簡介

陳盈方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本專題中心九十四年度碩士論文獎助得獎人

近年來，Hall 和 Soskice 等人的「Varieties of Capitalism」開啟了另一波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取向，並將資本主義的型式區分成 CMEs（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和 LMEs（Liberal Market Economies）二種不同的生產體制。這取向有別於過去的政治經濟學者，總是以福利國家作為核心的論述。Hall 和 Soskice 等人將以往過度強調鉅視面（如商品化）的結構分析，拉回到中間層次，強調組織與行動者的制度分析，尤其是資本主義經濟中十分重要的行動者—企業在社會經濟運作過程中的角色。

近來，有一些學者也漸漸發現雇主角色的重要性，而對雇主角色有一些討論。首先，日本學者 Estevez-Abe 從政治觀點為出發點，探討日本戰後的福利政策時，重視雇主的偏好在政治協商過程中的重要性。而 Swenson 在探討瑞典和美國在 1920-1930 年代的社會政策改革時，雇主在其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Mares 則是以德國失業保險為例，試圖從企業規模和勞工技術等面向，來探討這些因素如何形塑出雇主對社會保險的誘因。另外，Estevez-Abe 他們從技術類型的角度，來探討不同的勞工技術，會形塑出雇主對社會政策不同的偏好。而 Hall 和 Soskice 更是將企業視為生產體制的中心行動者，並認為企業不見得會反對福利國家，企業在工業關係、勞工技術、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企業內部關係等面向，都會影響到企業對制度的偏好與運作能力。在這些討論中，都一反過去對社會政策的觀點，總是認為雇主一定是反對社會福利的，並形成一種政治對抗市場的局勢。

然而，反觀對東亞福利體制的論述上，不外乎是以文化觀點、發展型國家、生產型的福利國家等觀點作為探討東亞福利體制的核心，且都跳脫不出以國家作為核心行動者的主要論點。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民主化過程，特別是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的民主化過程，以及在 1997 到 1998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之後，

這些因素不僅削減了東亞福利國家過去高度介入政治和經濟的功能，更重新定位了東亞國家的政府與市場間之關係。而伴隨經濟全球化所興起的福利多元主義，使得商業部門的角色更被視為是不可或缺的角色。這也意味著東亞國家的商業或企業部門將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雇主在福利政策的角色，亦將越形重要。

因而，本研究欲試圖以 Hall 和 Soskice 等人所發展出來的生產體制研究取向，作為研究的核心，並試圖探討屬於不同生產體制的日本和台灣，在社會保障體系（主要是退休和失業保障體系）上的差異性。並透過生產體制下的企業規模和勞工技術等要素，如何形塑雇主在承擔社會保障成本上的能力。而在企業規模和勞工技術對生產體制的形成過程中，會發展出屬於 CMEs 或 LMEs 的生產體制，他們所醞釀出的協商機制、產品策略、競爭模式等都是不一樣的。使得不同生產體制下對雇主所產生的誘因，會使雇主對社會保障體系產生不同的偏好，以作為企業在經濟市場上的制度性比較利益。

在本文的研究發現中，從制度層次上來看，我們可以發現東亞福利體制是與發展型國家的生產體制互相鑲嵌的。福利國家（福利體制）和資本主義（生產體制），二者應該是互相嵌合的關係，而此種體制之間的鑲嵌關係，都會在不同的福利國家（或福利體制）中，有特定的資本主義（生產體制）作為嵌合的制度。一旦生產體制或是福利體制之間的其中一種制度，遭受挑戰而面臨制度改變的情境，將會帶動與其嵌合的制度變遷。因此，我們依循 Hall 和 Soskice 等人對資本主義的分類，將資本主義區分成 CMEs 經濟體和 LMEs 經濟體，在東亞福利體制上的確是具有解釋力的。而日本和台灣不管在教育與職業訓練體系、金融體系、工業關係和企業間的協合網絡（垂直和水平）上，都發展出屬於他們的制度性比較利益，正如 Hall 和 Soskice 等人所認為的 LMEs 的制度架構提供企業擁有較佳的能力，能從事根本的創新；而 CMEs 的制度架構提供企業較佳的能力，從事產品上的創新。因此，為增進企業移轉成本的能力和在國際市場的效益，需要在生產和生產活動上分化出不同的國家模式，以及這些模式能反應出企業如何理性地回應國內的制度架構，而這卻是以隨機的地理結群所劃分出的模式所無法呈現的。

此外，日本和台灣在生產體制上所產生的制度互補性，不僅讓企業在成本移轉上和產品生產上，能更得心應手，不同制度間的制度互補性，諸如金融體系、福利體系、勞動市場體系、產品策略等，讓企業能透過獲取資訊、誘因、

契約等策略，以輔助企業的生產策略、企業結構和管理過程，去適應快速轉變的經濟市場，以減少成本。而這種「相互補助 (complementarity)」與「適應 (fit)」的策略，有助於增強企業的發展。正如 Amable 所認為的制度會透過一些誘因或限制，而影響組織間各行動者的行為。在以台灣所屬的 LMEs 經濟體下，制度的功能並不強烈，組織的行動主要是反應市場的價格，欠缺整合的連帶關係。然而，在屬於 CMEs 經濟體的日本，在強調整合的生產體制底下，制度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制度透過整合各個組織的行動者來解決問題，並且促進彼此間的相互合作，以減少在經濟活動中衍生的諸多不確定性，及由此而來的交易成本。因此，在整合的體制下，制度將會影響國內的物質資本、教育方式、勞動力等的配置，進而影響經濟成長。

若從部門層次的角度來看的話，在我們對東亞的論述中，我們嘗試從 Mares 對保險制度所勾勒出的光譜中，探討日本和台灣是否也能適用。而在我們的研究發現中可見，在 Mares 所劃分的控制面向上，屬於 Estevez-Abe 等人歸納出的企業專殊技能，和以大型企業為主的日本，在年金保險和就業保障上，我們都可以發現日本是朝向以企業為主的年金體系，並有著明顯的職業區隔現象，和終身雇用的高就業保障制度。而在失業保障上，是呈現相對較低的現象，以及由政府提供普及式方案。換言之，日本企業透過保費制或私人型的年金保險制度，作為一種控制勞工的工具，並增加勞工願意投資在技術上的誘因。而日本大企業也較有能力將這些非薪資成本轉嫁到產品上。然而，台灣在一般技能和中小企業為主的生產體制下，在年金保險和失業保障上，雇主皆呈現較敵對的態度。台灣雖然早期的社會保險制度是以職業區隔為主，但是晚近的健康保險和失業保險等各項福利津貼則是呈現普及性的性質。即使是即將實施的勞退新制，其特性是朝向以職業區隔為主，但政府強制介入的影響極深。

因而，台灣雇主在各項社會福利或保險制度上，是較傾向將責任外部化到政府身上，並提供限制性的普及式方案。日本和台灣在勞工技術和企業規模對年金和失業保障制度所呈現出的特性，正如 Mares 所預期的，需要高技術和以大規模為主的產業或企業，雇主對保險制度的偏好，會朝向以保費制或私人型的保險制度發展。而屬於技術低和規模小的產業或企業，雇主會較傾向選擇由政府提供普及式的保險方案，以減輕雇主的成本負擔。而在勞工技術的層次上，日本和台灣的勞工技術對年金和失業保障的影響，也正如 Ebbinghaus、Estevez-Abe、Iversen 等人所認為的，勞工技能會和社會保障制度產生一種制

度互補性，使得以企業專殊技能為主的日本，其呈現高的就業保障和低的失業保障。而以一般技能為主的台灣，其在就業和失業保障上，皆呈現相對較貧弱的現象。

「『他們回去做什麼？』： 影響返鄉泰籍勞工就業之因素」碩士論文簡介

黃士榜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本專題中心九十四年度碩士論文獎助得獎人

台灣現在約有三十萬名東南亞勞工，其中泰國人數最多。在假日的街頭上，與他們擦身而過，相信是大家都有的經驗，尤其是在我的家鄉—桃園中壢，工業區製造業工廠林立，所以對泰籍勞工的印象自小就深深植入我的腦海。尤其是假日在中壢火車站前的圓環，儼然成為泰國勞工的休閒聚集地，他們時而聊天、喝酒，或是相約要到酒吧、舞廳、外出旅遊。因此，筆者對於泰籍勞工並不感到陌生，也進一步引起研究泰勞相關議題的興趣。

在研讀相關文獻之後，發現台灣研究主要集中於生活管理、移民調適、育樂、犯罪問題等，且都是以台灣的觀點出發來紀錄與觀察，但對於其返回泰國的生活情況，卻少有人提及。

出國工作的泰籍勞工，在原鄉的工作以農業工作居多，而且在季節性失業的影響，會在農閒之餘到曼谷等大都市工作的習性。至於工作的內容以不需要高技術且需付出高體力型的工作為主。在討論返鄉泰籍勞工的就業時，研究者討論其在工作選擇上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或是其在選擇工作的背後動機為何？這也引起筆者的好奇他們返鄉的生活情形，「他們回去做什麼」？

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泰國自 1980 年代的經濟迅速成長，仰賴的是外資企業的投資。然而經濟發展的結果卻產生工資成長的壓力，外資企業也逐漸移往越南或中國沿海地區，在泰國的投資轉型為高技術與高附加價值的產業。泰國目前的產業轉型，需求的勞力為具有高學歷的勞工，相形之下，返鄉的泰籍勞工大多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產業的轉型對於其就業上是否有影響？

泰國一直存在嚴重的區域發展不均衡的問題，外資企業投資主要集中在曼谷周遭地區，主要原因是曼谷為政治經濟中心，並享有交通的便利。雖然泰國

政府為了要均衡區域發展，於第六個經濟與社會發展計畫（1987-1991 年）開始調整工商佈局，發展新的工業區，減少以曼谷為中心的老工業區壓力。其中，為了要調整工業佈局，泰國政府實施優惠與非優惠來疏導外資。因此依照各府的收入水平與基礎設施，將全國劃分為三大地區，提供外資企業投資的不同獎勵，分散投資過度集中曼谷之弊，雖然實施的成效已有初步的規模，但區域發展間的差距依舊存在。

傳統上泰國主要可分為四大區域：曼谷中央地區、北部地區、東北地區與南部地區，其中以東北地區受限於自然環境與氣候的影響，發展的程度最為落後，因此也是移出勞工最多的地方。而北部地區以山地丘陵為主，農業發展受到限制，而外資企業考量東北與北部地區地處偏遠，所以工廠設立較少，於是在農閒時候，是否會到曼谷等大都市找工作？

1980 年代泰國的經濟發展迅速，一方面泰國因勞力上漲與部分行業有「缺工」的情形，另一方面來自緬甸、寮國、柬埔寨勞工，進入泰國工作，使泰國國內的就業市場產生性的改變。進入泰國的外來勞工受到薪資較高的「吸力」進入泰國，當地雇主在成本的考量下，也樂於雇用外來勞工。泰國境內低技術勞工人數約有一百萬人，對於泰國的就業結構上影響的程度為何？政府的因應措施及政策為何？外來勞工從事的行業不需要高學歷與技術的工作，例如第一級產業、「3D」產業與建築業為主，而返鄉泰籍勞工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¹，是否於返鄉之後職業選擇會受到影響？

泰籍勞工返鄉之後，由於在海外的工作薪資較高，返鄉之後對於在泰國本地工作與薪資的關係，是否會產生對薪資的比較心理？如果有，返鄉之後的泰籍勞工在尋找新工作時會將再次出國作為選項之一？除此之外，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個體因素，其是否對於尋求工作的返鄉勞工有影響？

而返鄉泰勞最大的共同特徵是：擁有海外的工作經驗。而海外的工作經驗是否是選擇工作時的助力？在金錢運用上，亦為探討的重點，資本為創造財富的基礎，海外工作賺的錢購買不動產外，是否用於生財工具？該行為是否會改變其就業的選擇？

因此將本論文分為三大部分分析：泰國產業轉型後需求的勞力條件、外來低技術勞動力與返鄉泰籍勞工的個體因素等，個別分析其對就業選擇的影響。

¹ 依 2001 年出版，朱拉隆功大學之亞洲移民中新針對 461 位返鄉泰籍勞工的教育水準之抽樣調查，71% 為國小以下的程度。

所以針對返鄉泰籍勞工的就業問題討論上，研究者試圖藉由深入訪談法與亞洲移民中心（Asian Research Center for Migration）所做的調查數據相互檢定研究者所推論的影響因素是否為真。

二、問題意識

由上述的研究目的中可以歸納出本篇論文的問題意識：

（1）哪些因素影響會影響返鄉泰勞的就業選擇

影響返鄉泰勞的就業選擇因素，除了筆者上述推論的因素之外，尚有哪些因素？而筆者所推論的因素又是否為真？

（2）選擇職業的背後動機是什麼

返鄉之後的泰勞，在工作選擇上必定有其考量，筆者好奇其選擇某職業的背後動機到底為何？又他們的考量有哪些？

（3）選擇工作時又以什麼考量為重要

返鄉工作的泰勞，擁有在海外的工作經驗，假設其已有一筆積蓄，那他們選擇工作他們首要考量的是什麼？薪資高低？工作輕鬆與否？還是想要以什麼作為考量比較為要？

三、研究方法

本文將以蒐集的資料基礎，加以研究該群體返鄉之後的就業選擇。但於衡量筆者的經濟條件之後，如要做大規模的資料蒐集的可能性不高，因此將在能力範圍內蒐集相關的論文、期刊或是出版書目是可行的方法。因此，蒐集的文獻資料做相關的分析，以做論點的辯證，將是本篇論文一開始的重點。而國內討論泰勞議題的文獻大多針對其在台灣所引發的社會現象為主，到泰國蒐集資料將是重點之一。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Chulalongkorn University）之亞洲移民中心於2000年曾對該族群做抽樣的問卷與深入訪談，終於有較明確的資料可供參考。而亞洲移民中心內的藏書豐富，尤其對於泰國內外的人口移動研究，可讓研究者在撰寫論文時裨益，因此計畫前往該中心蒐集完整的文獻。泰國其他的學術機構與政府機關亦有豐富的藏書資料可以蒐集，因此出國可以給研究者相當的助益。

另外，研究者採用「深度訪談法」，對象是目前在台灣工作，且曾經出國兩次以上的男性泰勞，探討在兩次出國工作期間待在泰國所從事的職業。在訪談

的方法上，研究者都將採用非結構式的方式，事先擬妥問題，並隨時依據受訪者的回答或態度做適當的調整。因此本研究是以返鄉泰勞為主體，以其返鄉之後的就業選擇為主軸，並針對其背後的原因及影響其就業選擇作為訪談的主要內容。本論文的特点是採取「事件史」(Even History)的研究，透過深度訪談的效果，推敲出返鄉的影響因素與選擇動機。

四、預期成果

在蔡宏進與蔡青龍的研究中(蔡宏進，蔡青龍 1992:100)，泰國政府一向支持輸出勞工的政策，而泰國政府當局也甚寄望外移勞工能於學得較高的生產技術後，於返回泰國時協助提升國內生產技術水準。本論文希望能藉由筆者的研究，提供給台灣雇主做參考，是否能讓泰勞在台灣工作期間給予某程度的協助，給予海外工作經驗訓練特定的工作技能，幫助其返鄉之後能更快找到工作。

另一方面，本文討論泰勞就業的影響因素，希望能喚起泰國政府對於返鄉泰籍勞工的注意，亦讓泰國政府瞭解其在就業所面對的問題，在輔導就業時能夠獲得更大的助益。

參考書目

蔡宏進，蔡青龍。1992。《我國外籍勞工可能引發的社會問題及其因應對策》。
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馬來西亞華語藝術歌曲之研究： 以音樂家許元良之作品為例」碩士論文簡介

楊千羽

國立台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本專題中心九十四年度碩士論文獎助得獎人

馬來西亞華語藝術歌曲研究對音樂學領域而言，是一項相當新鮮的課題。本研究計畫主要的動機為：(1) 建立馬來西亞音樂文化之文獻，並保存現有的文化遺產。同時也希望所建立和保存的文獻，日後對有興趣研究馬來西亞各項課題的國內外學者皆有所幫助。(2) 馬來西亞華語藝術歌曲有哪些特色？本研究嘗試解答這個問題，並試著呈現馬來西亞藝術歌曲創作在一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環境裡所發展出的面貌。(3) 在馬來西亞的旗幟下，各民族的藝術歌曲、民謠、舞蹈、宗教音樂、傳統戲曲、舞台劇、器樂、流行樂曲等，都散發著其民族獨特的文化色彩。本研究嘗試釐清作為華人文化之一的華語藝術歌曲，在這個文化色彩濃郁的國家之定位和其重要性，並從華人音樂家許元良¹ (1935-2002) 之作品中探討中西方以及馬來西亞本土文化之間的融合與衝突。(4) 根據馬來西亞官方 2000 年的統計數據顯示，華族佔了馬來西亞人口的 26%，²不過馬來西亞國立大學所設立的音樂學士學位課程對華族音樂文化概況之介紹幅度並未達四分之一，至於華族音樂活動的論述也僅止於表面化的華樂、舞龍舞獅、布袋戲以及歌仔戲。因此，本研究計畫想藉此機會從音樂家許元良之音樂生活，建構許先生的音樂觀念與理想，從中探討他對華人文化和馬來西亞藝文界的影響與貢獻。

本研究計畫主要透過田野調查的方式在北馬、中馬和南馬收集相關資料，並觀察當地的華語藝術歌曲活動。文章結構方面則從縱向和橫向，兩方面切入：

¹ 許元良 (1935-2002)，是一位馬來西亞華人音樂家，擅長器樂和聲樂創作，生前非常活躍於華人娛樂圈，極力推廣華語藝術歌曲，更是一位熱心推動音樂教育的音樂教育家。

² 自馬來西亞獨立後，全國人口統計計畫每十年進行一次，2000 年為第四次的人口統計計畫。該計畫之報告可參考官方網頁 http://www.statistics.gov.my/Melayu/frameset_banci.php

在縱向方面，本論文藉由一些華語藝術歌曲的民間組織和人物串聯起馬來西亞華語藝術歌曲的歷史與發展；而橫向部份，則從音樂家許元良的個人音樂生命和作品延伸到社會層面，以深入探討華語藝術歌曲、華人音樂家、華人社會以及馬來西亞社會之間的互動和緊密關係。本研究希望透過這樣的結構安排，可以更完整地勾勒出馬來西亞華語藝術歌曲的風貌。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UTAR) 的成立 對華文民辦學院影響之研究」碩士論文簡介

高偉哲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本專題中心九十四年度碩士論文獎助得獎人

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興辦私立大學的計畫由來已久，2002 年 8 月 13 日正式成立的拉曼大學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即是其產物之一。拉曼大學 (簡稱拉大) 是馬來西亞政府於 1996 年完成私立大專法令後，由馬來西亞最大華人政黨馬華公會提出，在 2001 年 7 月獲得教育部核准設立，並且獲得華社籌集五億令吉支持所成立的。雖然，部分華人及馬華公會本身認為，拉曼大學的設立，單純地只是增加馬來西亞華人升學的管道或選擇；不過，對於傳統華教人士來說，拉大的設立，對其他的華文民辦學院將構成威脅與競爭，間接傷害華文教育在馬來西亞高等教育的「生機」。

本研究旨在探究，拉曼大學的成立對華文民辦學院的影響究竟為何？透過對南方、韓江和新紀元學院三所華文民辦學院於拉大成立後的辦學狀況、招生情形，或校務發展等，了解拉大的成立是否確實對這些華文民辦學院造成負面影響，瓜分華族辦學有限的資源。